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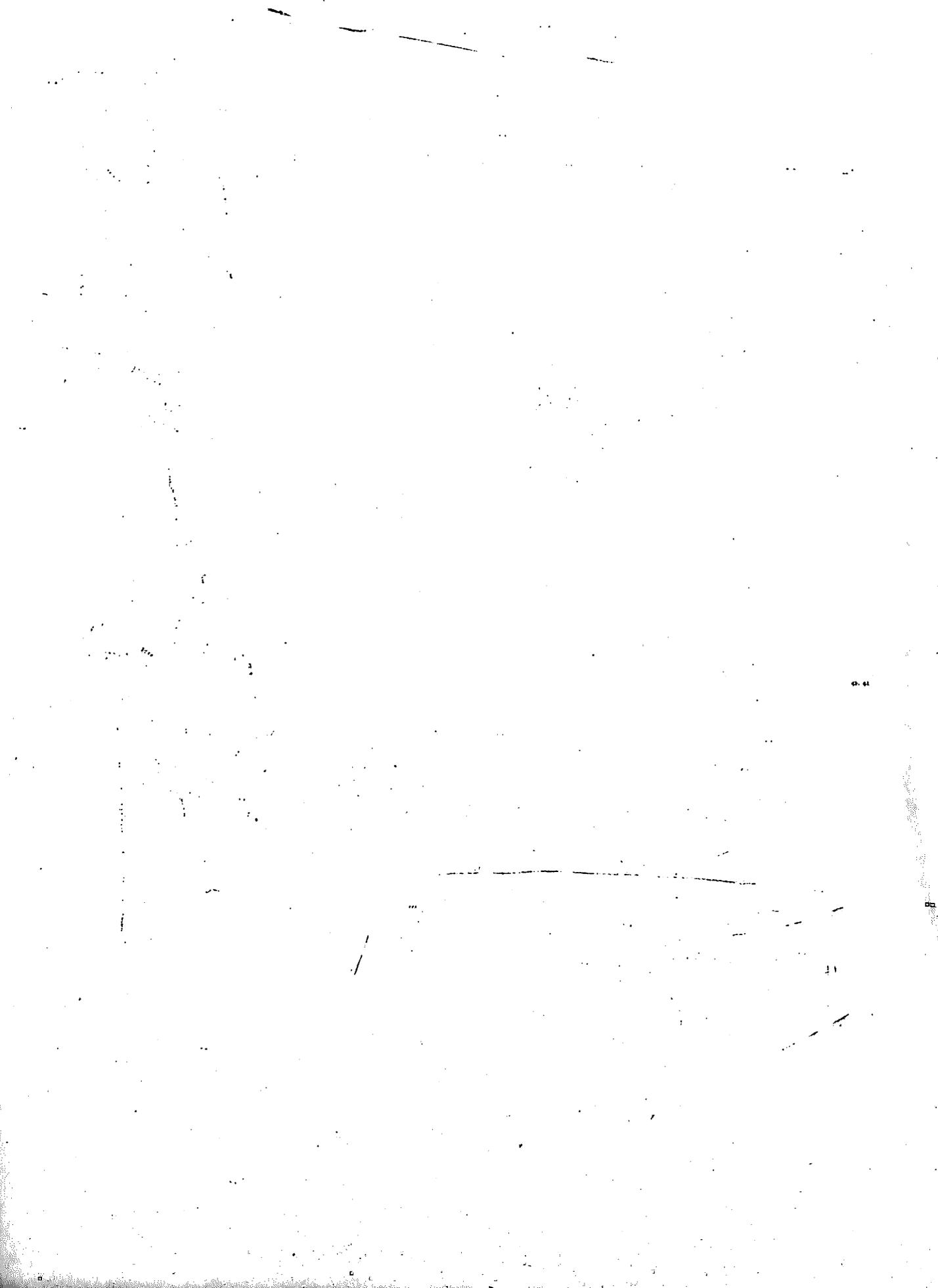
XUEXI YU PIPAN

学习与批判

4

1976

柳青泉 2/4



毛主席语录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学习与批判

一九七六年第四期 目 录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
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3)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
职务的决议…………… (4)

吴德同志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5)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5)

中共上海市委通知…………… (8)

批判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 短评：乘胜前进 深入批邓……………（9）
- 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瞿青（11）
- 《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康立延风（20）
-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28）
- 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共冶金机修二厂总支委员会（36）
- 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上海汽轮机厂第二车间党支部（39）
- 杂文
- 读《画皮》……………裘新（42）
- 从“优待券”想起的……………余辰（44）
- 白猫、黑猫、劳改犯……………傅宁华（45）
- 谣言考……………靳戈（47）

批判孔孟之道

- 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的斗争……………石镜（49）

文学史研究

- 韩愈与古文运动……………刘大杰（54）

近代史研究

- 向警予……………施东晖（63）
- 蒋介石上台的头十年……………义锋（70）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撤销入党介绍，行吗？

- 读苏修短篇小说《入党介绍》有感……………任捷（78）

- 附：入党介绍……………（81）

驳苏修的所谓“地理发现”

- 关于黄河源的发现问题……………石隶实（85）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 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中共中央

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 一切职务的决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中共中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吴德同志 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吴德同志四月五日在天安门广场发表广播讲话,全文如下: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

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

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通知

全市各级党组织：

(一) 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我们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决策。这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充分表达了上海一千万军民的共同心愿。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党中央的两个决议，坚决拥护党中央的两个决议。

(二) 中央决议指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我们要继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揭深批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彻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三) 我们坚决拥护对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并公开叫嚣拥护邓小平的反革命罪行。全市军民要加倍提高革命警惕，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四)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会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

批邓修正主义路线

回击右倾翻案风

乘胜前进 深入批邓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深入开展，乘胜前进。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发布了。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全市人民，怀着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决议，愤怒批判邓小平的罪行。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广大革命群众连夜召开声讨会，全市各个单位的大批判专栏和墙上立即贴出了声讨邓小平罪行的檄文，坚决拥护对制造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行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决心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阴谋，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邓小平推行的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因此，对这条反动路线的批判，必将遇到疯狂的抵抗和反扑。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对革命人民起了很好的反面教员的作用。邓小平不是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竭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吗？现在请看，一小撮阶级敌人如此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不是在明目张胆地要打倒无产阶级吗？阶级斗争如此惊心动魄，

熄灭了吗？

邓小平一手刮起的右倾翻案风，有它的国内根源和国际根源。毛主席曾经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了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吹捧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推出邓小平来充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发生，在国内，立即得到了被中国人民打倒了的盘踞在台湾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喝采。在国际上，极端敌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也发出了邪恶的笑声。但是，邓小平垮台了，你们的喝采和笑声不是很快就得化为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了吗？

捣乱必然失败。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曾经指出：“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这一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就有力证明：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

翻案不得人心。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最终都要成为历史的笑柄。邓小平的垮台不是又一次证实了这一条深刻的真理吗？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

翟 青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垮台了，这是全国革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反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一个伟大胜利。

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还有待于深入批判，他倒行逆施的反动罪行还有待于深入揭露。

现在，我们就把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拿出来示众。

文稿的题目很大，也很庄重，叫做《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这篇文稿洋洋一万余言，把“三项指示为纲”上升到“理论”，作了全面的、系统的阐述。奇文共欣赏。让我们同读者一起边读边议吧！

1. “毛主席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执行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文稿一开头，就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提了出来。但这个总纲是什么呢？不是阶级斗争，不是党的基本路线，而是“三项指示”，这是多么新奇啊！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右倾翻案风达到高潮的时候，他自以为看准了行情，决心把这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抛出来公开推销。于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就应运而生，在十月七日基本定稿了。这是炮制文稿的政治背景。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常识，也是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怎么？你们搞出一个“三项指示为纲”，是不是因为阶级斗争这个纲不灵了，过时了？

你们把三项指示并列为纲，只不过是把毛主席的指示作为推行修正主义纲领的挡箭牌罢了。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属于“目”，而不属于“纲”。你们硬要把安定团结

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纲目不分，这不过是新老机会主义玩弄折中主义的故伎重演。

同样地，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路线，有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之分。你们完全否认党的基本路线对具体工作路线的统帅作用，来一个三条路线并提，也还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

执行三项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吗？这是令人吃惊的混乱！在党的基本路线深入人心的今天，文稿的作者大概觉得，不提一提“基本路线”四个字，是难以遮人耳目的。于是，来了个偷梁换柱，一斧头砍掉前提，蛮横地把执行三项指示和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说成是一回事，连形式逻辑都不讲了。这样一来，不就把党的基本路线人所皆知的内容彻底改掉了吗？

手段的卑劣正好说明了目的的卑劣。邓小平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要把“三项指示为纲”强加于党，无非是为了改变党的《章程》规定的党的基本纲领，把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改成为是搞“四个现代化”，把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任务全部归结于搞生产建设。说穿了，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就是邓小平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作总纲”。至于图谋复辟成功的时间，从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急迫心情看来，他是并不希望有“二十五年”那么长的。

2.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这段话，可以当作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声明来读。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们，一眼就看得出，文稿讲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是有所指的。难道从“一月革命”风暴开始的向党内走资派夺权的斗争搞错了吗？难道把那些运用手中权力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内走资派打下台打错了吗？难道对一些地方、一些单位被党内走资派盘踞的堡垒一个一个地夺取都成了罪过吗？不，这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你们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革命同志，诬蔑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十足表明你们的矛头是对着毛主席的，是对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对着广大革命群众的。你们如此气急败坏地又蹦又跳，是不是想西山再起搞一场反夺权呢？

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你们是想得很厉害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授意炮制这篇文稿的同时，散布了这样一种论调，“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一概把它忘记，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提它了。我记性不好，都忘记了。”这里既表达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刻骨

仇恨，又是掩饰他反攻倒算的一块遮羞布。真的“记性不好，都忘记了”吗？没有。他念念不忘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念念不忘要夺无产阶级的权，表演得是够淋漓尽致了。他真的是不“想它”、不“提它”吗？不是。他一想起文化大革命就一肚子仇恨，他一提起文化大革命就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不是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公然以复辟派总头目自居吗？不是为“清隐士”、“举逸民”忙得不亦乐乎吗？不是公开提出要重用和依靠“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吗？不是在以种种借口排斥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吗？

听其言，观其行，才能搞清胡言乱语者的真面目。究竟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究竟谁接过三项指示塞进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私货？究竟谁在搞“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的罪恶活动？究竟谁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文化大革命胜利的太好形势诬蔑为“积重难返”？究竟谁在把一些地方和单位诬蔑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而妄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正是一小撮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账的走资派。你们自己搞修正主义，却诬蔑坚持反修防修的革命派是搞修正主义；你们自己搞复辟，却诬蔑坚持反复辟的革命派是搞复辟。这样看来，如果象文稿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不正是指使炮制文稿的邓小平的自画像吗？

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是翻案派的典型语言。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说过：“落实政策，特别是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文稿的语言同邓小平的胡说如出一辙！我们党内历次路线斗争，反对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罗章龙，反对李立三，王明，反对高岗，彭德怀，反对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我们搞批林批孔，研究儒法斗争，批判孔丘、孟轲、董仲舒、朱熹，都伤害了吗？总因物伤其类，才说得这种怪论。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不是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而是使许多有经验的老干部更加焕发了革命青春。而在邓小平看来，一系列的运动，就是一连串的伤害，一股不平之气冲天而起，充分暴露了翻案派的嘴脸。要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案，要翻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案，儒法斗争的案也要翻，这就难怪邓小平要杀气腾腾地猛刮右倾翻案风了。

3. “特别是在那些被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彻底揭露他们篡用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本“敌情谱”上，惟独没有提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粗心吗？恰恰相反，正是表现了文稿炮制者的细心和精心。如果把走资派也列入“敌情谱”，那岂不是要了邓小平的命？

你们漏掉了的，正好是最重要的。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一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里明确指出了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走资派，手中有权，搞起修正主义来是很凶的，很快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最危险的敌人。自称要同“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们，你们怎么连党内走资派这个词儿提都不敢提一下呢？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

这里顺便感谢文稿的炮制者，正是由于你们蓄意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更加启发了我们要对准斗争的主要目标；正是由于你们对走资派这一概念讳莫如深，更加启发了我们要特别重视同走资派的斗争。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不是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吗？这就从反面告诉我们，你们之间原来就是心心相印的。我们不会放松对社会上的反动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我们更加不会放松对走资派作斗争。今天，全国人民奋起声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

4. “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
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

请同志们注意：文稿用彩笔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绘了一张画皮：“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又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揭露和批判鸣不平，叫嚷给他“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他“搞修正主义”，都是搞错了。文稿攻击广大革命群众对他的批判“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目的，显然是为他在台上搞复辟稳住阵脚。

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
关系”吗？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吗？我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决不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而是更好地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进一步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存在的问题，坚持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推动生产的发展。

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邓小平，是真的关心生产，热心于四个现代化

吗？根本不是。他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热心的是资本主义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毛主席亲自为我们规划的宏伟蓝图。全国人民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正在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意气风发地战斗。我们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分歧，不在于要不要搞生产，而在于按照什么路线去搞。列宁说得好：“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试问：邓小平连阶级斗争这个纲都不准提了，连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要一笔勾销了，还要装出一副“好心抓生产”的模样，装得象么？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文稿的这一段忽然讲起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王明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很值得追究。明眼人一看，这是在别有用心地影射，是把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的今天，恶毒攻击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篇文稿不是别有用心地说林彪“同刘少奇相反”吗？不是说“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而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吗？不是说只要“肃清林彪的影响”而不提肃清刘少奇的影响吗？不是只提“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而不提刘少奇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吗？这骗得了谁？林彪路线是刘少奇路线的继续，都是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众所周知的。文稿大讲林彪“极左”，批林是假意，借批“极左”诬蔑和攻击文化大革命才是真情。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文化大革命时期说成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就可以神气活现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了。但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革命人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高的。邓小平把反攻倒算的右倾翻案风一刮，狐狸尾巴很快就被人们捉住了。原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所坚持的，正是已经破产了的刘少奇、林彪路线，是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本质依然是极右的。

5.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文稿这一段一开头就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根据，只能是枉费心机。列宁说过：“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英国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争论》）“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完全背弃马克思主义行为的挡箭牌了”（《英国的和平主义和英国的不爱理论》）。当年德国的拉萨尔分子搞机会主义的《哥

达纲领》，不就引用过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吗？邓小平授意炮制的文稿也来这一手，这不仅帮不了什么忙，反而进一步暴露出他们的修正主义面目。

文稿引用的列宁那句话，是列宁一九二一年十月在全俄政治教育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谈到新经济政策时说的。当时，苏联在经济上遭到严重的破坏，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和无政府状态的商品交换泛滥成灾。在这种情况下，不抓好经济工作，不解决经济任务，就不能保持苏维埃政权。正是在这一特定环境下，苏共中央制订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在谈到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时说过：“社会主义建设形式的改变，是由于目前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部政策上，正在实行特殊的过渡办法，在许多方面采取和以前不同的方式，用所谓‘新的迂回方法’来夺取一些阵地，实行退却，以便更有准备地再转入对资本主义的进攻。”（《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列宁这里讲的，退却是为了进攻，改善经济状况是为了对资本主义进攻。文稿为何要回避这一实质呢？为何要把列宁讲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歪曲成为政治要落实到生产呢？

文稿引用的毛主席那段话，是毛主席一九四五年在《论联合政府》中说的。毛主席这里讲的不是什么离开革命来发展生产力，恰恰相反，是讲只有搞好革命，解决生产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毛主席在讲了这段话后紧接着就说：“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毛主席说得这样明确，文稿却斩头去尾，肆意歪曲，这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目的当然是有的。是为了要以生产搞得好坏来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区别真假革命，区别工作的成绩是好是坏。这个话，完全出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实际上是主张一条资本主义路线。讲生产，不问路线行吗？衡量工作，不是以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这个纲来分析，而是一切以生产好坏为转移，所谓生产好就是政治好，这是一种典型的唯生产力论。

如果不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巩固，不问领导权是否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农群众手里，生产技术比较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岂不也可以称得上政治好吗？列宁说过，“美国在发展人类联合劳动的生产力方面，在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方面，都在自由和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同时美国也成了贫富间鸿沟最深的国家之一，在那里一方面是一小撮卑鄙龌龊的沉溺于奢侈生活的亿万富翁，另一方面是千百万永远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给美国工人的信》）按照邓小平的旨意炮制文稿的先生们，你们读过这段话没有？如果没有，请读一读，好吗？

6. “这三大运动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我们

去解决。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当然各自都有特殊性，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文稿板着脸的面孔说这一番话，总不会无缘无故。

纲举目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能推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两个“目”，你们承认不承认？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都极大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你们承认不承认？

就是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本身，正在成为推动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和财贸工作的强大动力，你们更是没有想到的吧！

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去谈什么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特殊规律，就是割裂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就是否定矛盾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用来指导一切工作的，既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又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及其文稿，那样公开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十足的修正主义。

7.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

“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符合这种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则要求人们及时地加以改革。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

在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论文中，花费这么多篇幅讲起规章制度，特别是责任制，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先看第一句，“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它的要害是否定工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邓小平在去年八月十八日谈到有关工业发展问题时，就讲了这么一条：“规章制度关键是一个责任制，现在问题是无人负责。要突出这个问题。”广大工人满怀着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度责任心，以主人翁的精神从事劳动和工作，怎么都看不见了呢？这只能说明你们是瞎子！

至于说规章制度要搞得“愈来愈严密”，我们倒想问一声，你们究竟想“严密”到什么程度？

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从资本家统治和剥削工人的相互关系出发，搞的规章制度多

如牛毛，“迫使人们奴隶般地分工”，是为了无限地榨取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西方资产阶级搞过什么泰罗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搞了什么“谢基诺试验”，是严密到连小便也要计算时间的管理制度。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叫嚷说：“现在搞制度，宁肯要求严一些”，是不是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搞泰罗制，搞“谢基诺试验”？是不是要重新搬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一套来？是不是妄想把社会主义中国的工人重新沦为奴隶？

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无产阶级当家作主。“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决定了工人群众是企业的主人，企业管理必须依靠工人群众，必须不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企业中也有专门的管理人员，但这些人同工人群众不应当是对立的关系。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的工厂企业里，批判了修正主义的办企业路线，认真贯彻执行“鞍钢宪法”，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显著地改善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焕发出广大工人的主人翁精神，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切，当然是使复辟狂邓小平大为恼火的。这篇文稿在说到制度万能、越严密越好时，公然鼓吹“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这真是一语泄了天机，原来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和资本主义社会一模一样的。没有比这更赤裸裸地主张复辟资本主义的了，真是彻底地代表资产阶级！

8. “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

数一数，九大“整顿”，从工业到农业，从科学技术到文教卫生，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军队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无所不包，统统要“整顿”，可谓天罗地网。怎么“整顿”呢？是要按照“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邓小平要“整”什么，“整”到哪里去，人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你看，邓小平的“整顿”令一下，全面反攻倒算的刀子就恶狠狠地挥舞起来了。在工业方面，搞了个《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提倡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整”两条腿走路，又想搞条条专政；“整”“鞍钢宪法”，鼓吹“马钢宪法”。在科技方面，抛出了所谓《汇报提纲》，反对科技战线“提无产阶级专政”，诋毁马克思主义对科研工作的指导，压制群众搞科研。在教育方面，则是“扭”“教育革命的方向”，从谩骂“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到鼓吹“挑中学生中好的，直接上大学”，总之要把教育革命的成果来个兜底翻，等等。所有这些，汇集起来，就形成去年夏季前后那股飞沙走石的右倾翻案风！

“整顿”的标准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句话，把他那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盘托出了。文稿说什么“整顿”“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不对。若是换几个字——“为了扼杀和取消”，就对了。邓小平“整顿”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大好形势，第一步是要“扭”回到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旧轨道去，第二步就是按照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一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整”出一个旧中国。邓小平叫嚷的所谓全面“整顿”，实质上是不准留下一点社会主义因素，不准存在任何一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从杀气腾腾的全面“整顿”声中，人们不禁会联想起当年围攻苏区时的那些狂叫“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的老还乡团分子。邓小平搞复辟的那种腔调和行为，不是活龙活现出一副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的面目吗？

*

*

*

文稿又长又臭，恕不一一引述了。

人们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而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邓小平授意炮制的这篇文稿，不是已经把他想说但还没有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吗？

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文稿的结束语还无耻地吹嘘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吹嘘他们的事业是“攻不破”的。这样地打肿脸充胖子，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虚弱本质。

你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事业是正义的吗？不。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心，党心，党员之心，都不赞成你们那一套。这一回，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革命大辩论，给右倾翻案风以迎头痛击，大得人心，赢得了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使邓小平完全陷入了孤立的境地。这就有力地证明：翻案不得人心。

你们的事业是攻不破的吗？不。群众一起来，邓小平就垮台了。邓小平本来是以为满有把握地搞成资本主义复辟，结果象一切蠢人一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连这样一篇文稿也未及发表，这对你们的“正义”性、你们的“攻不破”，不是最好的嘲弄么？

按照邓小平的预定计划，这篇奇文本来是要在一家他们谋划开办的大刊物上发表，唱一台重头戏。他们当时扬言：“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看那股狂妄劲儿，真想一“拳头”打掉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邓小平的黑手刚一伸出，就被广大革命人民揪住了。随着右倾翻案风的破产，那个大刊物未及问世，这篇论文也就成了未及发表的文稿。“未及”二字，具有必然性。它说明，任何倒行逆施行为，都一定不得长久，都一定不会有好下场。最近，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不是从另一个方面大大加速了邓小平的垮台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波涛滚滚，一浪高于一浪。马克思主义必将战胜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

康 立 延 风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宣判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政治上的彻底破产。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以及他留下的一批反面教材，正在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和批判。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是其中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汇报提纲》，是邓小平亲自挂帅，密谋炮制的，是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罪证。剖析这个提纲及其炮制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他在去年夏季前后一手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来龙去脉。

现在让我们顺藤摸瓜，看一看这个提纲炮制的“三部曲”吧。

第一步，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七月十八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走马上任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汇报提纲》。后来，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洋洋自得地表白：“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拚老命”，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账的走资派积压了将近十年的心声，今天总算从牙缝里迸出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在科学院这个地方“拚命”？原来，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故态复萌，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亮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他一手伸向经济领域，抓那个臭名昭著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手伸向上层建筑领域，抓这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声称：“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直言不讳地供认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邓小平看来，这两个文件就象围棋上的两只眼，抓住了这两点，复辟资本主义的全局就都活起来了。对于这样重要的一步棋，他们怎么能不“拚命”力争呢？

八月十一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带着一份墨迹未干的提纲草稿，跑到邓小平那里念了一遍。邓小平连连声称“很好”。但是，当这份草稿拿到有关人员中去“征求意见”的时候，却碰了个大钉子。许多同志指出，这份东西好象是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搞出来的，鼓吹的都是些批臭了的东西。可是，他们既已决心“拚命”，是决不肯回心转意的。

经过修改后的草稿，就再也不拿出去了，甚至对科学院的党的核心小组都实行“保

密”。他们把稿子送给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那个“理论家”心领神会，提起笔来就在稿子上勾画了一通：什么“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啦；什么“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啦，什么“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就算完事”啦。他还特别强调，必须“突出一个‘扭’字”。

八月十七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修改后的提纲初稿，一起送到邓小平手中。信中说：“这一稿在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话是说得够肉麻的，但同时也把邓小平对于提纲的“指点”作用和盘托出了。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的“关键地方”。究竟哪些是“关键”？信中没有明说，但是那个“理论家”要突出的一个“扭”字，倒是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他们要突出一个“扭”字，就必须把形势说成到了非“扭”不可的地步。提纲开头虽然写了一句“成绩是主要的”，但这种话不过是欲擒先纵，起点障眼法的作用。在“成绩”的下面，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片“危机”。请看，革命人民如饥似渴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被说成是“苛捐杂税”；工农兵占领教育、科技等上层建筑领域，被说成是“不要专业队伍”，“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科研人员坚持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被说成“不敢钻研技术，不敢看外文，不敢看业务书”；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被扣上了“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帽子；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干部，被骂成“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搞歪门邪道”。总之，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文化大革命“积重难返”，提纲就刻意承志，罗列一大堆“问题”，控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积重”，这对他们突出一个“扭”字，还不“关键”吗？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打击确实是够“重”的。要说“难返”，这也是事实。即使把“老命”“拚”上吧，不碰得头破血流才怪哩！

他们突出一个“扭”字，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提出“科研要走在前头”。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立即按照这个调门，大谈科研搞上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说什么“所有整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服务，为科研搞上去扫清障碍”，一切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围绕着这个转”。这些话都是唯生产力论的最典型的语言，因为它很“关键”，因而在提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不按他们这一套办，“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这是一句大黑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竟然会“完蛋”，他们的矛头所向，不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吗？但是，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的迅速破产，表明“完蛋”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和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倒行逆施越是猖獗，“完蛋”得也就越快！

科技界也要“扭”，当然更不在话下。提纲完全抹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鼓吹“不宜”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提倡“一个人、几个人”“钻研”。提纲竭力诬蔑从工农兵中培养的科技人员“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提纲的炮制者对从工农兵中选拔的科技人员视同洪水猛兽，竟然大呼“危险”，连连叫嚷

要“关上门”、“站上岗”，完全说明他们处心积虑要把科研领域搞成对于资产阶级毫无“危险”的土围子。

这个提纲，以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表明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同革命人民、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势不两立的立场。这也就是提纲从反面向革命人民提供的重要价值。

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六日，是炮制提纲的第二步。

八月二十六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亲自下令把修改提纲的任务交给了那个“理论家”。第二天，他就找那个“理论家”与科学院那个走资派面授机宜。他说：“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本来是气势汹汹，唯恐“扭”字突出得不够，为什么突然要“磨掉”一点“棱角”呢？这里有鬼。就在这前不久，毛主席发出了评论《水浒》，批判宋江投降主义的重要指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批判三百年前小说中的投降派宋江，却触痛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神经。他一方面心怀鬼胎地说：不要“听见风就是雨，听到什么，就好象出什么事了”，“你又不是宋江”；一面却变换策略，准备继续进攻。

邓小平说，要“棱角磨掉”，是因为“太锋利，站不稳”，担心锋芒毕露，容易暴露自己。他又说：“话要少说，说多了，要说得稳妥很困难。”这也是实情。要邓小平这种搞修正主义的人装成马克思主义者说话，话一多，当然会说漏嘴，露出马脚。但这只不过是策略的变化，而“原则都要保留”，策略的变化，正是为了坚持他们的“原则”，在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个“原则”上，他们是寸步不让的。

那个“理论家”看了提纲的第一稿，也嫌它“文字太陈旧，没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主张多用一些革命词句把这个提纲装扮一番。在搞修正主义方面，这位“理论家”比起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确实棋高一着。九月初，提纲修改稿拿出来了。如果说科学院那个走资派起草的提纲是剑拔弩张，凶相毕露，那么，经过那个“理论家”的一番修改润色，梳妆打扮，便更富有修正主义的色彩。

改动最大的是提纲第二部分。他精心编纂了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十条论述，并且加上“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的标题。看起来很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件那些语言”，实际上却要弄了不少阴谋诡计。

在这十条中，他根本不引毛主席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关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决不是。不然为什么你们口口声声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贯彻毛主席的路线，恰恰把最重要的指示给遗忘了呢？为什么对毛主席根本没讲过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感兴趣，非把它塞进去不可呢？

他们确实也引了一些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引用的呢？断章取义、阉割灵魂，折中调和、偷换重点，歪曲原意、为我所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

的,无所不用其极。例如第一条,引用了毛主席关于三大革命运动的语录,说这是“阐明了科技工作”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确实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你们主张搞的那套“科技工作”,难道能够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划等号吗?你们所热烈赞扬的“书呆子”和“白专”道路,难道能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重要作用”吗?你们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旗号下,照样搞那套脱离实际的“研究”了,照样推行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了,然而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积极参与炮制提纲的那个“理论家”曾经嚣张地声称:“光凭这十条就可以把他们压倒。”你们要“压倒”谁?要盗用革命的词句“压倒”革命的无产阶级吗?这一声狂叫,正好暴露了你们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凶恶嘴脸。

列宁说过:“机会主义可以用各种学说的术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表达。”这份修改稿玩弄的就是这样一套手法,对此,那个“理论家”是十分自鸣得意的,这就难怪邓小平为这种改法连声叫“好”呢!

其余部分的修改,也都是精心体现着“原则保留,棱角磨掉”这个狡猾的进攻策略。提纲初稿中一根根棍子的“棱角”是磨掉一些了,而且煞有介事地加上了“修正主义仍然是我院的主要危险”的话,但这恰恰是一根更为刁恶的棍子。

就在这段话后面,他们来了一个“但书”,写了一大段文章:

“但是,同这种修正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或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作随心所欲的片面解释,势必带来思想混乱,造成工作损失,甚至导致科技工作的严重削弱或取消,……这就仍然会陷入修正主义。”

原来,他们词典中的“修正主义”有其独特的含义。用他们的话来说,这种成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不同”甚至“相反”。看,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竟然就会出现“思想混乱”,导致“取消”科技工作,“陷入修正主义”。结论:批判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逻辑吗?很清楚,他们口中的“修正主义”,原来是强加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他们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理论不抓,科技不提”吗?他们不是声称“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存在着危机”吗?他们不是说“特别要强调干扰很大”吗?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在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作斗争”以后带来的。其实,邓小平本来就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他当然要痛彻心肺,恨之入骨。在这个提纲上,他们就是这样恶毒地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扣上一个“修正主义”的帽子。你看,既写上了“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类冠冕堂皇的话,又把棍子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这就叫“原则保留,棱角磨掉”!

与此同时,他们还赶编了一份革命导师论所谓“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作

为提纲附录。到九月下旬，经过反复琢磨，修改稿基本定稿。此时邓小平一伙是何等躊躇满志，洋洋得意啊！

于是，提纲的炮制工作进入了第三步。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汇报提纲终于拿出来汇报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听取汇报的时候，对提纲的修改又进一步作了“关键”性的“指点”。

他们名曰“汇报”“科学院工作规划”，但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汇报到科学院所属科技队伍人数时，邓小平立即打断他的话头，强调要把不属于科学院管辖的科技队伍人数加进去，他说：“如果不算上，怎能说明重要性呢？”再一次点穿了提纲要管“全国科技队伍”，要以此作为突破口、加紧全面地刮起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哼哼哈哈地发了一大通议论。他反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叫嚷“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请命”，说：“这些人是劳动者，科研是生产力。”积极参与炮制提纲的那个“理论家”赶紧为他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科学院的那个走资派汇报时说到，“现在不敢讲红专”，邓小平立即画龙点睛地作了发挥：“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该爱护、赞扬。”“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有余悸地汇报到怕抓辫子时，邓小平就给他打气壮胆：“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要他放手大干。

“汇报”之后，在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直接指挥下，从科技、教育、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加紧向无产阶级发起了进攻。他们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号召，奔走串连，或做演说，或写黑信，或筹划出版刊物，或精心撰写黑文，各种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复辟倒退的丑剧紧锣密鼓，右倾翻案风越刮越猛。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经一再强调：“国家嘛，科研要走在前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科技界应该打头阵。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领神会，立即加紧了复辟活动。

九月二十八日，科学院的另一个走资派用十分明确的语言，点出了汇报提纲的主旨：“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那当然只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了。

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则忙着巡视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传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指示”。他窜到半导体所，叫嚷：“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说复旧就复旧。那是为工作嘛！不要以名词吓唬人。”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甚至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过的孔老二黑话也搬出来当作宝贝，这不是很能发人深思的吗？

十月六日、七日，他继续奔走于心理所、电子所，进一步鼓吹业务挂帅，专家治所。他说：“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听你的’”，“敢不敢刮业务台风？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什么“业务台风”？不过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党的领导的一股妖风！

四天后，即十月十一日，他又作了充分的表演，针对有人批评他是“大右派”，作了自我

辩解：“我看也是先验论”。是“先验论”吗？不见得。就在这次会议上，他传达了邓小平的一段黑话：二十五年来我们的发展是不快的，工业发展不快，农业发展不快，科学技术发展不快，国防建设发展也不快。然后，话锋一转，胡说“形势大好”的一类话“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大概不可靠吧！讲累了，讲的大家不相信了，你看损失多大！”这还不解恨，他又进一步用煽动性的语言说：“很多同志对中央的决心抱怀疑态度。我经常说，过去几年有些同志讲了些不好听的话，怀疑政治，究竟算什么分子？什么言论？算资产阶级分子？右派言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确是一段妙不可言的独白。将这个走资派的“具体问题”作一“具体分析”，结论当然很清楚：你们炮制的这个提纲，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纲领，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的那些公开的和大量秘密的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言论和行动，同前几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煽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亡命之徒，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究竟算什么分子”呢？你们不是早已自己给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政治鉴定吗？

教育界那个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也不甘落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两次指名道姓地点了他的将，要他出来说话：“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于是，他加紧行动，到处“发表”右倾翻案的“演说”。他叫嚷，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思想上混乱”。几天里，他一连几次提出要“追根”的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根子在路线”。矛头所向，直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邓小平的授意，他准备依照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也如法炮制一个教育界的汇报提纲。他说：“中央能批下来，问题好办了”，“要不日子不好混”。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地也要炮制提纲呢？十月八日，他在研究炮制提纲的会上说：“科学院得后继有人，中心问题是教育部门的问题。”这句话，总算把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两股右倾翻案风扭在一起了。科技界“走在前头”，教育界保证“后继有人”，就象二胡上的两根弦，缺一不可，他们的配合是多么紧密啊！

上面提到的那个“理论家”也异常活跃。邓小平不是疯狂叫嚣“思想整顿是个关键”、“思想整顿量很大”吗？这个“量很大”的“关键”任务，自然落在那个“理论家”身上了。十月六日，这个“理论家”发表谈话，胡说“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因此要办一个“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狂妄地要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炮制成功，准备在那个未出娘胎便夭折的刊物上发表。这篇奇文，把各种奇谈怪论都上升成为“理论”，提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在这段日子里，邓小平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为资本主义复辟呼风唤雨。他肆无忌惮地叫嚷：“半年来，我们讲的中心是‘敢’字当头”。头子一声呼唤，喽罗跟着起哄。有的说：要“高举骨头”；有的说：“看破红尘”，“打倒我也不怕”；有的说：“我就是复辟派”；有的说：“我是还乡团队长，今天又回来了。”有的甚至公然学着还乡团头子胡汉三的口吻，声称“历史的账要冷冷静静地加以分析。”在邓小平的偏袒下，清华大学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再次跳出来，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黑信，造谣言，气焰十分嚣张。

张。提纲的炮制者公然叫嚷：“如果说他们（指清华那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是打开一个小缺口，那么汇报提纲就是打开一个大缺口，全面铺开！”这伙人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全面”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了。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就在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之际，全党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学理论，评《水浒》，抓路线，各条战线包括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他们的各种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批判。他们开始觉得大势不妙，但仍然负隅顽抗。在抓紧修改提纲第三稿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还干了两件事：一是查对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是否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二是编写马、恩、列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语录。请同志们不要忽视这两件事，这里包藏着作伪者的险恶用心！

他们说：“毛主席在听取某某关于科技规划汇报时讲，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是，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这句话。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当然也不可能在记录上找到这句话。但他们却胆大妄为，仍然把这句话作为毛主席的指示写进了汇报提纲之中。这是邓小平丧心病狂地把“老九不能走”的谣言强加给毛主席的做法的又一次表演。

他们还引经据典地说：“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又是捏造。他们编进语录中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但这段译文是译错的〔注〕。这本书的译者附记中明明写着：“译文还是个未定稿，草稿”，“译的不妥当甚至可能错误的地方一定还很多”。他们却将错误的译文当作宝贝，特别是那个“理论家”，竟一反“重视文字推敲”的常态，连校也顾不上校，便拿来大肆鼓吹，反复宣扬。这种做法，同林彪反党集团搞那个“称天才”的语录有什么两样！

他们为什么要死死抱住“生产力首先是科学”这句错误的译文不放呢？因为这是他们鼓吹唯生产力论的所谓理论上的根据，是他们招摇撞骗的救命稻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曾反复引用这句话，说什么：“马克思讲，生产力就是科学，在这些方面有全面认识很有必要，在本世纪走在前列很重要。”他们强调科学是生产力中的首要因素，目的是为了排斥阶级斗争这个纲，排斥党的基本路线，取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的继续革命。从这个唯生产力论的论点中，可以引出一条与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同他们的分歧，决不是要不要搞四个现代化，要不要搞科学技术，而是在于搞一条什么路线。他们鼓吹的这套修正主义黑货，并不是他们的新创造，而是从新老修正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勃列日涅夫就曾经鼓吹，当前正处于“在科学作为一种直接的生产力，其作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时代”。他们不是也鼓吹现在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主要搞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吗？“不须放屁”。什么“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这种话只是说给别人听听的。至于邓小平自己，不是从修正主义的武库里捡起破刀烂枪，气势汹汹地朝革命人民杀来了吗？一小撮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旗号的反革命分子，不是蓄意要在中国制造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事件吗？邓小平要人们丢掉无产阶级专政的刀子，正是为了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刀子架在别人头上。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让邓小平

的阴谋得逞，就会重演苏联从“科学技术决定一切”到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惨剧。什么“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原来是苏修上台的老路子！

正当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做着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时，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首先在清华大学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用提纲炮制者的话说，“路线斗争形势已明朗了”，提纲的最后修改稿，便没敢拿出来。提纲的炮制过程，只是作为一个失败的记录而给人民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颇喜欢谈论“历史”，那么让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分“贡献”。两个“提纲”，一条黑线，表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十年前炮制的那个“提纲”，是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他们今天搞的那个“提纲”，则是为了砍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那些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邓小平负隅顽抗，迅速陷入了革命大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扭转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顷刻覆亡。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将坚定不移地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胜利前进。

〔注〕 他们引以为据的马克思的那段话引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369页。其译文是这样的：

“最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固有的属性而体现在固定资本里面；这所谓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其次是在生产过程内部联合起来的社会力量，最后是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面去的技巧”。

可是，这段译文是翻译错的，经过我们校正，译文意思应为：

“总之：在固定资本中包含有作为资本固有属性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既有科学的力量，也有生产过程内部各种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有直接从劳动转移到机器，转移到死的生产力上去的技巧”。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 若干问题》选批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二十条”),是在工业战线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面黑旗。它狂热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大肆兜售被我们工人批得臭不可闻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条条专政、专家治厂、洋奴哲学,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反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反对“鞍钢宪法”。这个“二十条”,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胜利开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份反面教材,进一步揭露邓小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

所谓“前言”

“二十条”的开场白,煞有介事地摘录了一段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话。可是,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强调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这些极其重要的话,都被删掉了。“二十条”就是采取这种斩头去尾的手法,盗用革命词句,宣扬修正主义私货。毛主席最近在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时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赌咒发誓要搞的“现代化”是什么货色?已由最近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一伙反革命分子说出来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四个现代化日”,原来就是复辟资本主义日。我们分析“二十条”的具体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要搞现代化是假,反对革命化是真;把生产搞上去是假,把红旗搞下来是真。

所谓“工作总纲”

【原文】“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全

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纲。”

〔批判〕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妄图以目乱纲，以目代纲，采用釜底抽薪的恶劣手法，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在去年五月、七月把“三项指示”说成是“一个时期的纲”，到八月又说成是“一切工作的纲”，在八、九月份炮制的“二十条”中就成为“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就可以看出，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不是偶然的一个“提法不妥”，而是他有计划、有步骤的复辟行动。

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最近，我们上海工人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有力地推动了生产。轻工、化工、仪表、电力等各个系统的生产，今年第一季度都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真是纲举目张形势好，推动生产节节高。这是对“三项指示为纲”的有力批判，是对右倾翻案风的迎头痛击。

所谓“引进先进技术”

〔原文〕 “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必须虚心地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为我所用，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要反对一概照抄照搬，也要反对没有学会，就乱改乱动。”

〔批判〕 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基点是放在自力更生上。那些依赖别人发展经济的国家，是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无数事实证明，我国人民是完全有能力在科学技术方面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二十条”却大吹外国技术的“效率高得多”，一味强调要“尽快地”、“虚心地”、“迅速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请看：明明我们“以万吨的干劲造万吨轮”，船越造越多，越造越好，他们却偏偏要花上百万美元，进口外国资本家丢掉的“瞎眼船”。明明我们早已造出了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这样的先进设备，他们还是要接受苏修四五十年代的陈旧的发电机组。他们老是把眼睛盯着国外，双手伸向国外，向洋大人哀声乞讨什么“先进技术”，这不是要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吗？

毛主席说：“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我们对于外国的技术，必须一分为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设计，是为垄断资产阶级追逐高额利润服务的，有着鲜明的阶级烙印，岂可以不分“白猫黑猫”搬来就用？在邓小平看来，只

要是外国的，都是“好东西”。谁要对外国东西中不合理的部分进行批判改造，他就气势汹汹地给你扣上“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大帽子，下令不准“乱改乱动”，充分暴露了他的反动的洋奴嘴脸。

所谓“增加工矿产品出口”

〔原文〕“为了加快我国煤炭、石油的开发，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按照国际贸易中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等通行作法，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固定几个生产点，由他们供应适合需要的现代化的成套设备，然后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原油偿还。”

〔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乞讨外国资本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竟然不惜用我国宝贵的资源作为抵押品，真是卑躬屈膝，丧权辱国，我们工人肺都要气炸了。我们查了一下，苏修《真理报》不久前也曾经鼓吹过：“更充分地利用我国的天然资源，并为此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怪不得，邓小平吹嘘的这个“大政策”，原来是从苏修“引进”来的！

按照这个“大政策”，我们能生产的，却无限制进口，我们很需要的，又拚命地出口，这样下去，我们国家岂不是变成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我们工人岂不是变成外国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了吗？由外国资本家出技术，出设备，利用我国的矿藏和劳动力，让外国老板发财，这种事情过去李鸿章干过，袁世凯干过，人民公敌蒋介石也干过。我们工人的血汗是怎样养肥那些外国老板的，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不可能自主。邓小平那个“大政策”，实际上是向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大投降，是对国家主权的大拍卖。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决不容许的！

所谓“整顿企业管理”

〔原文〕“一概反对企业管理，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

〔批判〕企业管理是有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超阶级的企业管理。我们既反对无政府主义，也反对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管、卡、压”。“二十条”捏造一个“一概反对企业管理”的谎言，不过是玩弄“把显然愚蠢的思想加到论敌身上，然后加以驳斥”（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的拙劣手法，目的是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斗、批、改的成果，为修正主义企业路线翻案。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批判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进一步确立了工人在工厂的主人地位，企业内部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我们上海，工人群众按照“鞍钢宪法”的基本原则，就创造了许多工人参加管理的形式，

并且把它定为制度。我们热情欢呼这种革命的秩序好得很！“二十条”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我们的斗、批、改污蔑为“一概反对企业管理”，造成“管理混乱”，提出“必须整顿企业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实质上是要一概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管、卡、压”那一套货色，打着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旗号，干复辟资本主义的勾当。

〔原文〕“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問題，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要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抓思想政治工作。”

〔批判〕毛主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工厂企业只有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才能使企业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群众的一种创造。“二十条”不提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另外要建立一个“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们强调要“独立”于党的领导之外，去“处理生产中出现的問題”，实际上是不准党委抓生产领域中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自成系统，另立中心，架空党委，党政分治，搞修正主义的“一长制”，篡夺企业的领导权，变社会主义的企业为资本主义的企业。

〔原文〕“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没有严格的责任制，生产只能打乱仗。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的一环。每一件工作，每一个岗位，都要有明确的职责；每个干部，每个工人，每个技术人员都要有明确的责任。”

〔批判〕社会主义企业搞好生产和管理主要靠什么？是靠责任制，还是靠人的觉悟？我们搞社会主义大生产，固然需要必要的责任制，但更重要的是对干部、工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职工的政治觉悟，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制度要有利于群众”。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我们主张依靠工人群众建立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章制度。企业如果不依靠广大工人群众来管理，即使是合理的规章制度，也可能用来对工人实行“管、卡、压”。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责任制提到“核心”的地位，目的是排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企图诱骗工人只要搞好“一件工作”，守住“一个岗位”，埋头生产，不问政治，听任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

对比文化大革命前后企业管理的变化，我们深深感到，不讲路线，不讲共产主义风格，只讲责任制，这种责任制甚至会起破坏生产的作用。例如，过去有的行业明文规定操作工只管操作，检修工只管检修，设备出了故障，明明操作工可以排除，也非要停下来等检修工来修不可。这简直是把工人的积极性卡死在专职分工的框框里，变成分工的奴隶。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群众提出：“分工虽不同，都是主人翁”，既实行合理的分工和必要的岗位责任制，又打破了束缚工人手脚的过细过死的狭隘分工，各种形式的会战和“一专多能”活动蓬勃开展，我们许多工人现在所做的，已经超出了岗位责任制对自己的要求。不肯改悔

的走资派邓小平诬蔑现在是“没有责任制”，“生产打乱仗”，这不是要倒退回去吗？我们要严正告诉他：办不到！

所谓“两个积极性”

〔原文〕“对于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大企业，中央有关部门不仅要管方针、政策，管统一计划，而且要管产品的调出，管当地不能解决的重大物资的供应。”

〔批判〕根据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的指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批判了条条专政，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改革，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成果。

但是，“二十条”竭尽污蔑之能事，以“任意”、“违反”、“擅自”、“乱拉乱用”等十条罪名，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绝大多数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后工业战线上出现的大好形势。它打出对下放企业“不能撒手不管”的旗号，千方百计地扼杀地方的积极性，为刘少奇、林彪一伙所搞的“条条专政”翻案，在工业战线上搞反攻倒算，搞复辟倒退。他们开口“集中”，闭口“统一”，这也要“管”，那也要“收”，就是企图把下放企业“管死”，把国民经济计划“统死”，把地方积极性“卡死”。妄图把下放企业“统一”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把下放的权力“集中”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手中，变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为走资派所有制。

〔原文〕“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执行。不顾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就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批判〕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列宁说：“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各尽所能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只有各尽所能，发扬共产主义劳动精神，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才能正确对待和执行按劳分配。工人同志说得好：“要在各尽所能上作贡献，不在按劳分配上兜圈子。”

我们既要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的必然性，又必须看到限制在按劳分配中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二十条”只讲“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一面，只字不提不适应的另一面，实质上是否定分配领域中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妄图保护和扩大这块产生资本主义和新资产阶级的土壤，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至于所谓要按“能力强弱、贡献大小”进行分配，就是公开宣扬为钞票而劳动，谁劳动得好钞票就拿得多，这是赤裸裸的物质刺激货色。这样“刺激”出来的，决不是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积极性”。对于文化大革命前搞物质刺激的祸害，我们工人

记忆犹新。那时，月评月奖变成了“越评越僵”，严重腐蚀了工人队伍。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不是叫嚷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吗？既然他自己“贡献”最“大”，“分配”也理所当然要最多。说到底，这种“按功论赏”原来是维护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的。

〔原文〕“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

〔批判〕这里诬蔑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完全是闭着眼睛说瞎话。如果要讲条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广大工人的共产主义觉悟。一九五八年，我们工人自觉提出取消计件工资，有力地冲击了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你们看见了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批涌现，反映了共产主义精神的动人事迹层出不穷，你们看见了吗？我们认为，只有坚持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才能逐步为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创造条件；否则，资产阶级法权就会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资产阶级法权是走资派的命根子，怪不得我们一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要反感，要痛得哇哇叫了。

毛主席说：“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应当看到，当前的分配领域中要防止和反对的主要倾向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扩大等级差别。即使对所谓“平均主义”，我们反对的是“绝对”平均主义，而主张大体平均、共同富裕。“二十条”反对“搞平均主义”，实质上是对抗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推行物质刺激、钞票挂帅的修正主义路线鸣锣开道。

〔原文〕“要实行正常的升级制度。按照职工的劳动态度，技术能力的提高，劳动和工作中的表现，……每年提高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待遇。”

〔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这里笑眯眯地开出一张支票：“每年提高工资”。话是说得很好听，但是仔细一看，不对了。能够提高工资的只是“一部分”。哪“一部分”呢？这里有三条标准，这三条标准，只讲劳动，不讲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讲技术，不讲革命。这就是说，你老老实实跟着他那条修正主义路线跑，做他的驯服工具，他就给你尝一点甜头；你起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那就要给你吃苦头。这种“升级制度”，是他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胡萝卜”和“大棒”，一是收买，二是镇压，过去资本家就是这样干的嘛。依了他那个“升级制度”，能够“升”上去的那“一部分”，就成了忘记工人阶级历史使命、背叛工人阶级的工人贵族、技术贵族，而广大坚持革命的工人非但不可能“升”，而且还要“降”，“降”为受一小撮走资派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这个办法可真恶毒，我们工人决不上这个当。

所谓“关心职工生活”

〔原文〕“对群众生活中的困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根本要不得的。”

〔批判〕我们党历来关心群众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进一步有所提高，这是不可否定的铁的事实。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打出“为民请命”的招牌，好象只有他最了解人民的疾苦，最关心人民的生活。他的“关心”，实际上是包藏祸心。他胡说：“没有菜，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更好？”这是对国民经济大好形势的恶毒诬蔑，是对我们工人阶级的无耻诽谤，也是对党和群众关系的恶意挑拨。大庆工人头顶青天，脚踏荒原，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了大庆油田。大寨贫下中农在七沟八梁一面坡，滴水贵如油，十年九不收的艰苦环境下，改天换地夺得丰收。难道是靠什么“猪肉”“刺激”出来的吗？这种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邓小平的这种谬论是林彪“诱：以官，禄，德”的翻版，是裹着糖衣的砒霜。

所谓“又红又专”

〔原文〕“要造成一个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钻研技术和业务的空气，特别要注意使两者互相结合而不是互相对立。要积极为广大职工又红又专创造条件。”

〔批判〕毛主席历来提倡又红又专。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工厂企业里，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人理论队伍，七·二一工人大学，群众性科研活动，“三结合”的技术革新和新品种试验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迅速成长。

而“二十条”既诬蔑我们把红与专“互相对立”起来，同时又施展折中主义的看家本领，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钻研技术和业务”并列起来，抽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技术、业务的指导作用，达到颠倒红专关系，宣扬白专道路的罪恶目的。他们否定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诬蔑党对知识分子不关心，竭力鼓吹“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应爱护，赞扬”。联系他们到处煽动人们刮“业务台风”、“经济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等奇谈怪论，就不难看出“二十条”打着“为广大职工又红又专创造条件”的幌子，实际上是鼓动一些人走白专道路，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人材”。

所谓“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结尾的这两节中，“二十条”煞有介事地大谈“提倡唯物辩证法”，妄图给这个条例贴上一张“唯物辩证法”的标签。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二十条”到底是提倡辩证法，还是用折中主义冒充辩证法？以“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发展工业的“总纲”，就是纲目并列，纲目颠倒，以目乱纲的折中主义的典型。又如，在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说什么，一方面，不注意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方面的继续革命，“是很不对的”；另一方面，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也是很不对的”。在党的领导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讲“党委统一领导”，另一方面又大讲“建立强有力的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系统”。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都是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混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从这一现象的哲学根源来看，这是用折衷主义和诡辩论来偷换辩证法。”（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二十条”大谈“辩证法”，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

然而，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分析批判“二十条”，就撕下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冒充辩证法的画皮，揪住了他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黑手，抓住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狐狸尾巴。所谓“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的，正是他们。他们在“二十条”中，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业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和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概加以否定，横加指责；而对刘少奇、林彪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却颂扬备至。充塞“二十条”的恰恰是刘少奇鼓吹了十七年，林彪妄图塞进党的“九大”报告中去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修正主义黑货。如果照“二十条”那一套去办，那就是资本主义在工业战线全面复辟。

我们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我们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我们愤怒声讨首都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要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革命、生产一肩挑”，是广大工人的共同决心。我们一定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彻底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为部分工人理论骨干学习班集体讨论写成）

积极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中共冶金机修二厂总支委员会

党中央决定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我们全厂职工热烈拥护。几个月来，我们厂的干部、党员和工人群众，不断提高了对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越来越看清了邓小平的狰狞面目，从而不断增强投入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要提高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就一定要剥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张张画皮。为此，我们首先组织理论骨干队伍，把邓小平重新工作以来的奇谈怪论，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加以对照，看他怎样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的。比如：

毛主席一贯强调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邓小平却抛出了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要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而邓小平却公然说：现在“一切为了现代化”，“全党要多讲”“这个大局”。

毛主席说，对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邓小平却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脱离实际”，又说现在没有物质基础，“怎么限制？”他甚至蛮横到连“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都不准提。

毛主席发表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邓小平却居心险恶地造谣说：这是“有人借这做文章”，还说什么“不要听见风就是雨”。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一经对照，就可以看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动本质，这就极大地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无产阶级义愤。过去有些人认为，邓小平只是“说话太放肆，好心办坏事”，现在认识到，他是“句句话里包祸心，条条对着毛主席”。

要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就一定要揭露邓小平所推行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危害性。为此，我们就发动广大群众进行了两条路线的对比，看看邓小平是怎样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着干的。比如：

在毛主席“教育要革命”的路线指引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邓小平却攻击“教育有危机”，要“扭”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路上去。毛主席指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而他竟然胡说：七·二一大

学“不是唯一的形式”。毛主席高度赞扬“赤脚医生”，而他却嘲笑“赤脚医生”“穿草鞋”、“水平低”、“知识少”。毛主席大力支持文艺革命，而他却说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毛主席提出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而他诬蔑“三结合”是“三凑合”。毛主席号召工人学理论，他却恶狠狠地下令“一律取消”。毛主席支持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提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他大唱反调，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谩骂工人阶级领导是“占了茅坑不拉屎”。真是不对照，搞不清，一对照，是非明。邓小平恶语四溅，竭力诋毁和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新生事物，推行的完全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党内的资产阶级。这就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同邓小平和他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就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我们不坚决回击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吗？能不能把当前这场斗争搞深搞透，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是一场生死对立、不可调和的大斗争。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就更坚定了我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信念，决心把这一场斗争进行到底！

要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不仅要提高对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而且还要使广大工人和干部加深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为此，我们又抓住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把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和刮右倾翻案风中的奇谈怪论进行对照，从他的“不肯改悔”，来看走资派还在走。早在一九五六年他就鼓吹：“今后的任务就是搞生产，现在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今天又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叫嚷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一九六一年，他宣扬“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今天又贩卖“只要把生产搞上去，不怕业务挂帅”，鼓吹白专道路；一九六一年，他曾提出要把企业管理的混乱局面扭转过来，“要治乱，矫枉必须过正，宁肯过些，如果没有严格的词句是扭不过来的”，今天又翻出了这些滥调，讲什么“现在是积重难返”，“要‘严’字当头”，全面“整顿”；一九五八年，他曾贩卖过“每人每年六十斤肉，每天半斤苹果，再加二两白干”的“土豆加牛肉”式的假共产主义，今天又大搞“五子登科”一类的修正主义“仙山琼阁”，等等。工人同志气愤地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风前’‘风后’一副嘴脸，老调重唱，本性难改。”他口头上讲“永不翻案”，但一旦重新工作，就全面翻案，全面搞复辟。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教育，广大工人越来越懂得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并认识到，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邓小平所坚持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定要长期地批，反复地批！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搞翻案，搞复辟，不仅有他的阶级根源，而且还有他的思想根源。翻案派和一切复辟派一样，总是要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思想宝库中寻找复辟倒退的理论根据，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体会到，只有进一步深刻揭露邓小平和历史上一切复辟派在世界观上的共同特征，才能把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批林批孔运动在这方面已经为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邓小平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都是尊孔派，孔孟之道是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我们

就发动工人群众把他的复辟言行和孔孟之道相对照。通过这样的对照，使大家看到了邓小平是怎样跟着孔老二亦步亦趋，息息相通的。这就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一切反动没落的阶级总是要推行“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反对变革，反对前进。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本性和反动世界观所决定的。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我们还深深体会到，要把这场斗争引向深入，还必须把学习和批判紧紧地结合起来。几个月来，我们举办了十几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大学习推动了大批判，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不断向前深入发展。

最近，一小撮阶级敌人狗急跳墙，公然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极大地激起了我厂职工的无产阶级义愤，也使大家进一步认清了邓小平的反动嘴脸。工人群众说，“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批右倾翻案风，大干社会主义”。群众性的批判会、声讨会一浪高似一浪，生产形势也越来越好。今年全厂在第一季度不但完成了国家下达的生产任务，而且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点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已经成为我们广大工人的决心。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上接 84 页)

厂长冷淡地说：“如果您对这个那么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告诉您，我的工资是二百五十卢布。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今后与您无关的事，请不要干涉。”

“你的事情甚至和我大有关系。”

鲁胡拉瞪着眼睛说：“原来是这样啊？你凭什么这样说？是谁给你权力让你用首长的腔调和我谈话的？”

阿拉海尔对自己说：“镇静，千万镇静，可别喊出来，可不要骂人……”于是他镇静地说道：“我当然不是你的首长，这却很遗憾。我要是你的首长，我就会因为你袒护骗子手而追究你的责任，我就会因为你过的生活明显地超出了你的工资水平而查办你……可是在十五年前，是我介绍你加入党。对这件事我要负责一辈子。虽说现在已经晚了，我还是决心改正我的错误。鲁胡拉，我要撤销我对你入党所作的介绍。我要把我这个决定通知区党委。”

他转身走了出去。

鲁胡拉神色慌张地在屋子中间站了一会儿。他妻子不安地进来看了他一眼。大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鲁胡拉急速地迈开步子朝穿堂、朝楼梯平台跑去。从楼下传来了一阵不慌不忙的、沙沙的脚步声，招呼一声，把老头叫住？……哎，不能啊！一个厂长不能失去尊严啊……再说，这个固执而任性的师傅也未必会回来的……

阿拉海尔师傅走下台阶，尽情地让凉爽的秋风吹着自己燥热的脸膛。现在他心里觉得轻松了，轻松多了！于是他朝着无轨电车站走去。

(吉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工农兵学员译)

坚决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

上海汽轮机厂第二车间党支部

我们二车间是专门生产柴油机的一个老车间。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激励着我们车间工人群众的革命热情，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工人们说，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纲领，借发展生产为名，行取消阶级斗争之实，猖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就是要同他来个针锋相对，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给以迎头痛击。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全车间从老工人到青年工人，人人参加战斗，写大字报，开批判会，狠狠批判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各种奇谈怪论。几个月来，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胜利开展，车间的各项工作和生产面貌都有很大变化，第一季度柴油机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成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著。斗争的实践再一次说明，只要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的一套对着干，革命和生产就能不断向前发展。

列宁说：“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企业只有充分发挥广大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才能真正把生产搞好。文化大革命前，我们车间搞过一整套“管、卡、压”的修正主义的管理制度，工种分优劣，分工如分家的现象严重。低级工不能做高级工的活，辅助工不能上机床，“各开各的车，各推各的铇”，压抑了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人群众冲破了狭隘的眼界，打破了技术等级森严的局面，辅助工学会开机床的多了，工人群众之间相互支持，互相协作也加强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这一巨大变化，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就象列宁指出的那种“哭丧妇”一样，“哭资产阶级纪律”，“哭资本主义秩序”，污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糟”了，大肆叫嚷要重新“整顿”，恢复“管、卡、压”的一套。工人群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人口口声声要“整顿”，其目的无非是要整掉我们工人群众的主人翁精神，取消我们工人群众在工厂中的主人翁地位。老实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决不是什么破过头，而是还要继续不断地破下去。最近以来，我们狠批了邓小平抛出的那十几条、几十条的修正主义条条框框，工人之间的相互

关系更加密切,修正主义的等级制也受到进一步的破除。磨床组有一种磨柴油机曲轴的工艺,过去一直规定,要四级以上技术工才能干。这个小组只有一个工人能干这个活。今年二月份,这位工人正好病假,产品装配又在等曲轴。怎么办?一位只干过二年磨床的青年工人在老工人、技术员的协助下,大胆上磨床,结果磨出的一根曲轴质量比以往六级工磨的还要好,本来一般误差在十丝之内,这根曲轴的误差却不到五丝。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不依靠工人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搞好生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车间管理人员“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自觉性。车间管理人员在批判邓小平鼓吹的“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谬论的同时,改进了管理工作。柴油机零件上万,工序多,环节多,周期长,计划管理有一定复杂性。以往计划工作都是计划员自己排,自己心中有数,工人群众只知生产,不知进度。生产稍有脱节就往往影响整个进度。今年一季度,生产任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四十,计划任务就更繁重了。计划员把计划交给群众,与工人一起排计划,定进度,然后又把计划表贴到每个工人的机床旁,使每个工人做到上下道工序心中有数。这样,改变了过去那种上下脱节、生产不平衡的局面,使整个车间的生产象接力赛一样,配合得好好的,一环紧扣一环。计划人员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被动的局面,能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参加劳动,帮助工人搬运零件,主动充当辅助工。由于依靠了群众,一季度计划得到了全面的完成。计划人员深有感触地说:“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邓小平心目中根本没有群众,我们心中就要时刻装着群众。”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进一步促进了技术人员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车间三十多个技术人员,对邓小平极力鼓吹“白专有用论”、恶毒挑拨党和知识分子关系的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开批判会的时候,他们邀请老工人参加,共同回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历程,有的还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种种恶果。车间的技术人员多数是旧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毕业的,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在车间,却整天坐办公室,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设计柴油机的不懂怎么开柴油机,搞工艺的不懂开机床,连扳一个螺丝有多大分量也不知道,往往设计的图纸一大堆,搞出的东西却成了废品。文化大革命后,技术人员下放劳动,在劳动实践中,没经过几年都学会了一、二门手艺。更主要的是,通过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不少人每天和工人一样,手上、衣服上都沾满了机油,帮助工人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搞技术革新。文化大革命前,技术人员中工人欢迎的少,不欢迎的多,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回顾这前后的变化,技术人员激动地说,毛主席指出的走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是我们应当走的光明大道,我们吃够了走“白专”道路的苦头,尝到了走又红又专道路的甜头。现在邓小平又胡说什么“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爱护、赞扬”,这是要我们跟着他们复辟、倒退。我们一定要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金光大道,坚定不移地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走下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

争中，全厂技术人员分成四个工段，全部下车间和工人群众一起，边学习，边劳动，大搞技术革新。在与工人共同战斗中，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了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个车间有个柴油机连杆钻孔，劳动强度一直很大。过去，钻一个孔要两小时，工人要用手摇三百多次。工人群众早就有改革工艺的强烈愿望，却一直没有得到有力的支持。这次下去听取了工人们制造专用设备的设想，群策群力，一起动手，不到一个月就造了出来；原来两小时钻一个孔，现在只要花一小时，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我们还通过揭发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崇洋迷外的罪行，激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的革命精神。一九七二年三月，我们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支持下，确定了一个改革柴油机结构的项目，定名为“723”。工人搞科研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生事物。这样重大的科研项目，在过去修正主义路线干扰下，是根本不许工人插手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后，工人搞起来了，并且已经初步有了成果。参加这个科研项目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在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时说：“文化大革命是‘723’的春天，邓小平鼓吹洋奴哲学，不相信工人群众的创造力，我们就是要加快科研的步伐。”最近，“七·二一”大学学员到我们车间，我们还同他们一起大胆地向一些不适应生产需要的洋机器开了刀。这些洋机器，文化大革命前被走资派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活宝，又是局管，又是部管，工人群众要动一只螺丝钉也不准。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改革了一大批不适应生产发展的洋机器。去年年底以来，我们先后对两个国家的镗床、钻床进行了改革。其中一台镗床，过去马达经常烧坏，一出毛病，就得停机。这次我们把机床的电路全部重新设计，换上国产的电气设备，使这部机器提高了效能。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把我们车间的革命和生产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抓革命、促生产的结果。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必将大大推动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如果按照那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办法，生产是上不去的，或者暂时上去了，社会主义企业就会走偏方向，就会变修，最终必然还是要破坏生产力。工人们说：“我们工人阶级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力军，邓小平搞修正主义，我们就是要同他对着干。”现在，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还要进一步深入。我们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认真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继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继续搞好企业的斗、批、改，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读《画皮》

裘 新

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则叫《画皮》的故事：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袱独奔，甚艰于步，急走趋之，乃二八姝丽，心相爱乐。问：“何夙夜踽踽独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忧，何劳相问？”生曰：“卿何愁忧，或可效力，不辞也。”女黯然曰：“父母贪赂，鬻妾朱门，嫡妒甚，朝笞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将远遁耳。”问：“何之？”曰：“在亡之人，乌有定所？”生言：“敝庐不远，即烦枉顾。”女喜从之。生代携袱物，导之同归。女顾室无人，问：“君何无家口？”答云：“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怜妾而活之，须秘密，勿泄。”生诺之，使匿密室，过数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陈，疑为大家媵妾，劝遣之，生不听。偶过市，遇一道士，顾生而愕，问何所遇？答言无之，道士曰：“君身邪气萦绕，何言无？”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将临而不悟者。”生以其言异，颇疑女，转思明明丽人，何至为妖？意道士借厌禳以猎食者。无何，至斋门，门内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逾堦垣，则室门亦闭，蹑迹而窺之，见一狞鬼，面翠色，齿嶙嶙如锯，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已而掷笔举皮，如振衣状，披于身，遂化为女子。睹此状，大惧，兽伏而出，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迹之，遇于野，长跪乞救。道士曰：“请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觅代者，予亦不忍伤其生。”乃以绳拂授生，令挂寝门，临别，约会于青帝庙。生归，不敢入斋，乃寝内室，悬拂焉。一更许，闻门外戢戢有声，自不敢窥也，使妻窥之。但见女子来，望拂子不敢进，立而切齿，良久乃去。少时，复来，骂曰：“道士吓我，终不然，宁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坏寝门而入，径登生床，裂生肚，掏生心而去。……

蒲松龄笔下的这只狰狞恶鬼，披着一层彩色的画皮。它把“齿嶙嶙如锯”的真相隐藏着，给人以绝代佳人的假象，迷惑性特别大。王生为什么会被狞鬼弄到裂肚掏心的地步，还不是因为被一张艳丽画皮迷了眼吗？

寓言神话中的鬼是各种各样的。就说吃人的魔鬼吧，既有青面獠牙的，也有披着画皮的。就其欺骗性和危害性而言，用画皮装扮成天下第一美人的魔鬼更厉害。

现实生活中当然没有《聊斋志异》书上说的那种鬼。但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

斗争中，却依然可以看得到迷人的鬼影在游荡。明里是人，暗里是鬼，“铺人皮于榻上，执彩笔而绘之”一类的画皮鬼伎，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画皮的功能可谓大矣！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群众的揭发和批判，露出了昔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今日的走资派的真容，就用一个“永不翻案”，装出了一种虔诚改悔的样子。但是，他复辟资本主义之心不死，一旦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要兜底翻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翻案不得人心”，于是，他又得耍点名堂。他刮起的那股右倾翻案风，要复辟倒退，搞掉无产阶级专政，血腥气味是很浓烈的。他使在上面喷洒几滴香水。你看，他装出了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又是“好心抓生产”，又是“热心科学技术”，又是“关心群众利益”，诸如此类，一笔一笔地彩绘，把自己塑造成救世主。其姿色，那简直可以同天下第一美人媲美了。

但且慢。马克思主义告诉了我们一个好方法。即：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

邓小平的所谓好心、热心、关心，通通都是画皮包着的祸心。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深入发展，他那一张张画皮正在被广大群众剥掉。他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的是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害是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是“好心抓生产”吗？不是。如果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那就会出现“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复辟情景。他口口声声“一切为了搞上去”，结果只能是搞到莫斯科去。是“热心科学技术”吗？不是。科技战线连无产阶级专政都不准提，那只能是让科学技术抓在资产阶级手里。是“关心群众利益”吗？不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只有通过资产阶级的专政才能得到保障。他既然那样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那关心的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天堂，劳动人民的地狱。可见，邓小平披画皮的第一个目的是“遮己”，即伪装自己那副走资派的庐山真面目。

遮己为了迷人。这，是画皮的另一种妙用。邓小平诱惑有术。“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是他的一句名言。什么叫共产主义呢？他描绘了一个“仙山琼阁”：“每家都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台电视机，每人每年六十斤肉，每天半斤苹果，再加上二两白干。”这岂不是比“土豆烧牛肉”更多几分诱惑力吗？那就是说，只要你跟着他跑，就有车、有机、有肉、有酒、有苹果。他的潜台词是：知识分子跟着我走白专道路吧，我给你好房子，小车子，配书记，配后勤。工人跟着我搞“二十条”吧，我给你一大把花花绿绿的钞票。干部跟着我搞倒退吧，我给你应有尽有的特权。这一切诱惑，同《画皮》中的狞鬼用色相来勾引王生，其手段不是颇为相象么？

然而，“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游鱼为了贪吃一小段蚯蚓，结果成了钓者的盘中美味。王生为了贪得一个“二八姝丽”，人妖不分，连五脏六腑都被魔鬼给挖掉了。邓小平搞的物质刺激，也是居心险恶的，要诱你参加他的“还乡团”，投奔他为头子的复辟派。“吃了他家的茶，自然是他家的人啦！”这种交易所经纪人的手腕，早已成了一切政治骗子的阶级品格，是很值得人们警惕的。

捣鬼有术，降魔更有道。《画皮》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正当那个狰狞恶鬼自以为得

计之时，道士赶到，经过激烈搏斗，恶鬼身上的“人皮划然而脱”，画皮一经剥去，恶鬼就技穷了，只得“卧嗥如猪”地死去。剥画皮，这是打鬼的好法子。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对付恶鬼们的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对于如邓小平这样的恶鬼，我们的办法也是剥画皮，把他“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在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中，邓小平那副狰狞面目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无产阶级剥画皮最锐利的武器，不是什么“绳梯”，而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管邓小平有多少张画皮，也不管他怎样不断变换多少色彩的画皮，只要我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匕首，把他一一剥掉，那就会使他露出狰狞面目。看今天这个邓小平，不已陷于彻底孤立的境地，成了一只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了吗？

从“优待券”想起的

余 辰

《决裂》中的共大分校副校长曹仲和，由于瞧不起共大而要女儿投考“名牌院校”，为此，不知从哪一个后门弄来了一张报考单。这番苦心遭到女儿拒绝以后，他诧异而气忿地说：“我革命几十年，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

“优待券”，这提法颇新鲜。对证古本，原来是有来历的。在《水浒》中，它就叫做“丹书铁券”或“誓书铁券”。地主头子柴进，就靠了他是周世宗柴荣的灰孙子，而拥有这么一纸“丹书铁券”。凭这一“券”，就可以享受各种世袭的封建特权，连《水浒》的作者都看得眼红，几次三番地把它亮出来。所以，这类“券”，实际上就是特权的同义语。所不同的是，曹副校长以自封“革命”而要自己连同自己的子女都享受特权；“柴大官人”则是靠他是“龙子龙孙”而享受特权。他们都以得“券”享权为目的，则是一样的。

“革命几十年”就“应该”“讨一张优待券”么？如果“应该”，那又何必糟蹋革命这个神圣的名词呢，干脆就叫“做买卖”不就得了吗？一分大洋一分货，“几十年革命”一张“券”。不是做买卖又是什么呢？难怪无产阶级革命派把曹副校长这类人的参加革命叫做“入股”，把“得券”思想叫做“入股思想”。

入股分红，俗谓之“剪息票”，现在的青年大概很少听说的。曹副校长的话：“我革命几十年，讨一张优待券还不应该吗？”则似乎很耳熟。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说过：“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劳、劳、劳”的自卖自夸，不也是讨“优待券”吗？

在邓小平看来，“功劳”也好，“疲劳”也好，都无非是一种本钱，凭了这点本钱，就可以将本求利，因此而说它是一种入股思想，一点也不冤枉。说一个人参加革命带着“入股思

想”，对方怕不大肯接受。因为“股”啊，“息”啊，这类术语从来为资产阶级所惯用，而与革命则甚少关联。如果把“入股思想”换成另一种说法——论功行赏，即按功劳（就算也包括苦劳和疲劳）来分桃子，就象发明“二桃杀三士”的相国齐晏子所设计的方法——“计功而食桃”，那末也许有些人就会欣然同意的。不是么，不久之前，邓小平还振振有词地发问：“你们对奖金怎么看？”怎么看，就是这样看吧：按功劳吃桃子和按股份分红利，其间也没有一百步之差，还不都是凭着有某一种本钱而可以居于另一些人之上。都是表面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一言以蔽之，资产阶级法权而已。

因梦想着“优待券”或醉心于“剪息票”而“入股”革命的人，即使参加民主革命，也是勉强的。鲁迅先生在告诫左翼作家时早就说过：“我以为‘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这就论证了想得券享权而“入股”革命，必然沦落为右翼的规律。民主革命尚且走不通，何况以消灭一切私有制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呢？

干革命有功劳、苦劳、疲劳，自不待言。然而，为解放全人类而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者，对此又何足挂齿。如果把这些“劳”作为商品待价而沽，交换“特等饭”、“特等车”，那样，这样的“劳、劳、劳”，无非是“捞、捞、捞”。“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如此而已。脑袋里只有资产阶级的那些通行的原则，身上背了“三劳”（功劳、苦劳、疲劳）的沉重包袱，眼睛死盯着越来越多的“优待券”，这样，如何迈得开继续革命的步子呢？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变了，当年参加革命的人的地位也变了（做了大官了），而世界观却不肯变——还是资产阶级的，结局一定不妙。这类人物一旦掌权，就必然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曹仲和到邓小平，都是例证。

白猫、黑猫、劳改犯

傅 宁 华

对猫、鼠一类的动物，人们司空见惯。除了动物解剖学专业工作者以外，一般人并不着意去研究它。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则不然，多少年来一直念着白猫、黑猫的捉鼠经。所谓“不管白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他的一句名言。

这个“白猫黑猫”论的最早出笼，是在一九六一年。那时候，国内外反动势力利用我国遇到的三年自然灾害，复辟之风刮得甚紧。同刘少奇合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邓小平，也特别扯高了调门叫卖“三自一包”的黑货。他拿猫捉老鼠作比喻，是为了论证，“只要能增

产,单干也可以。”他以会捉老鼠为标准,猫不管黑白,实际上是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多打粮食就是好的“主义”。他“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于是,单干成了他心爱的一只会捉老鼠的好猫。

抛出“白猫黑猫”论的邓小平,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的揭发和批判,改悔了没有呢?他不肯,而且大搞反攻倒算。

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便直接指挥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炮制了一个《汇报提纲》。在听汇报过程中,为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贩卖那个“白猫黑猫”论,他特别再次赞扬了一个劳改犯,说什么“真空冶炼是劳改犯搞的”。

谎言最怕事实来戳穿。这里就讲一讲真空冶炼的发明史吧!

早在一九五八年,上海电炉厂的广大职工,急国家所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创造成功了每炉能够冶炼一百五十公斤的真空冶炼电炉炉体。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就造出了十公斤、二十五公斤两种规格共十一台成套的真空冶炼电炉,填补了我国电炉技术的空白。

那么,那个劳改犯同真空冶炼又有什么关联呢?此人本是一个反动的资产阶级技术人员,在“三反”“五反”中被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被判了死刑,缓刑两年,以观后效。后来,被押送到东北某地进行劳动改造,被留在一个劳改犯工厂搞点技术。由于他懂一点抽真空技术,那个工厂的厂长带着这个劳改犯来上海电炉厂参观真空冶炼电炉制造技术。回去以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才仿造了一台十公斤的真空冶炼电炉。

这就是历史事实。人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是怎样往劳改犯脸上贴金的。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白猫黑猫”论的鼓吹者邓小平就吹捧那个劳改犯是“废物利用”的样板。十多年过去了,那个劳改犯又成了他鼓吹“白专”道路的标本。他对那个劳改犯念念不忘若此,大概这也是一只“抓得住老鼠”的“好猫”吧!

从白猫、黑猫、劳改犯,我们又想到了那个《汇报提纲》。在炮制《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邓小平讲起“白专”来是滔滔不绝的。他说,“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又说,白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还说,对白专应该“爱护,赞扬”,甚至叫嚷着要把第一流的“白专”料子“提到领导岗位上”。啊!我们明白了,原来他对“白专”的理论是如此系统:第一是不怕,第二是有好处,第三是爱护、赞扬,第四是提拔重用。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邓小平爱的岂止是一个劳改犯?他在拼凑复辟资本主义的“还乡团”时,不是打出“落实政策”的旗号,要限期“请隐士”出山吗?他完全背离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从反动的实用主义哲学出发,只要坚决贯彻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只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二要算账的,统统可以算是“好干部”,即“抓得住老鼠”的“好猫”。如果按照这个“白猫黑猫”论去办,那就不要多少时间,牛鬼蛇神就会神气活现地一齐跑了出来,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改变颜色的情景。因此,我们决不可小看邓小平要搞的“废物利用”。

白猫、黑猫的捉鼠经可以休矣!

谣 言 考

新 戈

最近,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一个重要手段,就是煽动一股极其反动的政治谣言风。

谣言成风,说明有造谣者在呼风唤雨。这股风是从阴沟洞里刮出来的,怕见事实,怕见阳光,故谓之阴风。其初也,噤噤嚅嚅,若隐若现,言者欲吞还吐,闻者疑信参半;其盛也,蜚蜚扬扬,不胫而走,“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聪者惑”;其终也,一旦真相大白,立即销声匿迹,连制造者也不得把头缩进了乌龟壳里。去年夏季前后,当那股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时,各种政治谣言应运而生,同“经济台风”、“业务台风”,有上下呼应之实,得异工同曲之妙。最近的谣言风,完全是同去年的政治谣言一脉相承的。

谣言其物,固然是如同《红楼梦》中惯于造谣中伤自己哥哥的贾环其人那样,“上不得台盘的”,但考其源流,却也久远悠长。简而言之,自有阶级斗争以来,一切反动派就把造谣当作自己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他们手中没有真理,不得不乞灵于谣言攻势:或捏造事实,歪曲真相;或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或移花接木,嫁祸于人;或借题发挥,打开缺口。真是花样多端,层出不穷。

儒家,造谣就是他们的一大特长。孔老二给法家先驱少正卯扣上五条罪状,不靠谣言是办不成的。奴隶起义英雄柳下跖痛斥孔老二“作言造语,妄称文武”,“摇唇鼓舌,擅生是非”,尖锐地揭露了这个“巧伪人”是个造谣专家。儒家儒家,其实是谣言世家。戈培尔鼓吹的造谣一千次就可以变成真理这一类骗子哲学,发明权应当是属于他们的。韩非在批判儒家时对此有很好的揭露。他说:“言之为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就是说,谣造得多了,容易使人轻信。没有的事,十个人造谣说有,就会令人半信半疑;一百个人跟着说,就会令人信以为真;一千个人附和,人们就确信不疑了。他还讲了个“三人成市虎”的故事,庞恭有一次问魏王:“如今有人说城里有虎,你信吗?”回答是:“不信。”“两个人说有呢?”“也不信。”庞恭再次问道:“那么三个人说有呢?”这次魏王答道:“寡人信之!”这个故事,说明了谣言是怎样蛊惑人心的。

反动派造谣,有着极其险恶的用心。鲁迅指出:“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动。”政治谣言,更是直接为反动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可以从中察觉这个阶级的进攻目标和走向。举其大者,有如下数端:

其一,制造复辟倒退的舆论。战国时代的旧贵族就曾经把谣言当作复辟的工具,“大者排世,小者惑下”。秦王朝建立后,那些反动儒生“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率群下以造谤”,

一阵风刮得可不小。“造谤”，即造谣。什么天上掉下一块有字的石头啊，什么鬼物传了一句话就忽然不见了啊，说得活龙活现，凿凿有据，矛头直指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强烈地反映了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希望。

其二，为野心家篡夺政权呼风唤雨。唐代初年，徐敬业勾结裴炎发动叛乱。他们的智囊人物骆宾王“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好一个裴炎“当殿坐”！他们想干什么，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其三，借谣言打击进步力量。战国中期，法家诗人屈原受命根据法家路线制定“宪令”，旧贵族代表上官大夫之流就造谣说：“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终于使屈原受到排挤打击。屈原在《离骚》中的两句诗：“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就是控诉这件事的。再看唐代的例子。王叔文革新集团“本无可罪”，顽固派为了把他们打下去，造了很多谣，什么“朋党相煽”，什么提拔“侥幸速进者”，什么“挟邪乱政，不宜在朝”，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含怒窃发，中人形影”，革新派或遭迫害而死，或被长期放逐。“曾遭飞语十年谪”，便是积极参与这一革新运动的刘禹锡的遭遇。请看，反动派在制造政治谣言时，对进步力量包藏着多么深的杀机！

其四，颠倒历史，实行翻案。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在当时和后世，受到过无数谣言的攻击。那些搞翻案的人，把华山崩了块石头，天上出现个彗星，也说成是变法的罪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和他冒名顶替抛出来的《辨奸论》，以及话本小说《拗相公》，更是造谣作品的典型。直到清代学者蔡上翔写了《王荆公年谱考略》，为王安石“辨诬”，也就是辟谣，才部分地恢复了被颠倒的历史的本来面目。

总而言之，反动派在想什么，他们反对谁，拥护谁，往往会通过谣言表达出来。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这样。不见最近的这股政治谣言风吗？什么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啦，什么“由邓小平主持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啦，凭空捏造，五花八门。但这样一来，就完全暴露了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企图抬出邓小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些谣言，反映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意志和愿望，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风。

谣言之有迷惑力，在于它无中生有，以假乱真，迎合了有些人爱听小道消息的毛病。其实，识破谣言，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一分析，很快就可以使它原形毕露；而且可以通过谣言顺藤摸瓜，揪住谣言制造者的黑手。最近的谣言风，对邓小平是那样地歌功颂德，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是那样地切齿痛恨，同邓小平在大刮右倾翻案风时的种种造谣诽谤，一吹一唱，互相呼应，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难道不正表明这股谣言风的风源，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吗？对于他们放出的谣言，必须坚决揭露，彻底追查，决不允许它蛊惑人心。

造谣决不会有好下场。列宁指出：“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希特勒、赫鲁晓夫是惯于造谣的，而今在哪里呢？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大肆制造谣言和诡辩，也灭亡了。邓小平重演故伎，带头刮谣言风，只能加速自己的垮台。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反革命谣言制造者，同样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

论太平天国内部 尊孔和反孔的斗争

石 镜

一八四三年初夏,在广东花县一个乡村私塾里,年方三十岁的塾师洪秀全当着学生们的面,把应当朝夕焚香礼拜的“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的牌位砸得粉碎。

这一砸,犹如一声霹雳,使得整个旧世界张惶失措。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凝聚着农民阶级郁积已久的愤怒,表达了革命农民对反动的孔孟之道的强烈抗议。广大革命农民满腔的阶级仇恨象沸腾的岩浆冲破地壳向上喷发出来了。

在洪秀全砸了第一块孔丘牌位后,很快,就有大批的人跟上来,砸了第二块、第三块……。一八五一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天国革命健儿们到处砸碎孔丘牌位,捣毁孔丘偶像,焚毁孔庙,把学宫正殿改成马厩或屠宰场。他们将“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①,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②,掀起了广泛深入的群众性反孔运动。

伟大的农民革命家洪秀全,这个最早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亲手点燃了反孔斗争的烈火,在太平天国革命酝酿和突飞猛进的过程中,又从千百万农民的革命实践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把反对孔丘、批判儒家学说的思想斗争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政治斗争紧紧结合在一起。“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③这是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最大特点,也是这场斗争带有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的重要原因。

革命农民们猛烈抨击了维护封建皇权的孔孟之道,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封建皇帝斥之为必须打倒的“阎罗妖”。为了打倒“阎罗妖”,他们叱咤风云,横戈跃马,转战十八省,以摧枯拉朽之势,打垮了各地的地主政权,建立了农民的革命政权。

革命农民们深刻批判了儒家维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制的谬论,热烈地宣传了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平等思想,制定了“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宏伟蓝图。“谬误在天国的申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陷入了窘境。”(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许多贫苦农民

自动抗缴租米，斗得往日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们威风扫地。

太平天国反孔斗争的暴风骤雨，引起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他们攻击这场大革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使得“士不能诵孔子之经”，孔丘、孟轲“痛哭于九原”，说这不仅是“大清之变”，而且是“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们不仅集中反革命武装进行军事“围剿”，在思想文化上也加紧宣传孔孟之道，向革命农民疯狂反扑。

地主阶级和革命农民这两大对立阶级之间的搏斗，不能不反映到革命队伍中来。与阶级敌人的进攻相呼应，在太平天国内部逐渐出现了一股尊孔逆流。

一八五三年一月，太平军攻占武昌，这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省城。就在这里，发生了负责“总揽军政大纲”的左辅正军师东王杨秀清到孔庙“朝圣”的事件。据记载，当时，武昌城内“庙中神像尽烧毁，惟圣宫牌位不敢毁伤”，杨秀清“具衣冠谒圣，行三跪九叩礼。”④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一八五三年五月，杨秀清突然宣称“天父下凡附体”，说：“‘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以及‘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等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推翻了不得诵读四书五经的严令，要恢复读经。洪秀全提出，对于孔孟经书和史书，应先加删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待他本人亲自披阅以后，再刊刻颁行⑤。杨秀清就命令自己的亲信左殿右丞相曾钊扬等设立删书衙，一手把持了删削工作。

这年十二月，杨秀清又假托天父下凡，训诫洪秀全“主宰天下，凡事皆要从宽”，借口洪秀全“性气太烈”，没有做到这一点，要将洪秀全杖责四十。他还一再告诫洪秀全，必须遵循“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准则⑥。

“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这是孔孟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集中表现。“事父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俱出自《论语》，是孔老二用以维护没落奴隶制的基本信条。杨秀清欣赏这些东西，并要把所谓“凡事皆要从宽”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法则”，这说明杨秀清中孔孟之道的毒已相当深了。杨秀清反复以“天父”名义宣布：“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⑦实际上是要在太平天国内部为孔孟之道的存在争取合法地位。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历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太平天国内部尊孔思潮的出现，与背离太平天国革命理想的政治逆流是分不开的。

革命农民为了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封建等级制度，热烈地拥护“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平等思想。然而，占领天京以后，这种平等思想逐渐被一些人抛弃了，制定了一套又一套仿造《周礼》的礼仪制度。“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陈旧的教条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举凡官制、宫室、朝仪、称谓、冠服、旗帜、舆马等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等级森严，不准稍有逾越。违反者，轻则被鞭答，重则立遭极刑。比如，“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⑧这与当年杨秀清和太平军战士“敝衣草履，徒步相从”⑨的情况成了极鲜明的对比。一八五四年六月，杨秀清在一份诰谕中指出，“一切礼仪制度，荷蒙天父时时劳心下凡教导。至天父下凡教导万民圣旨，则降托本军师口出。”⑩可见，这些“礼仪制度”是杨秀

清一手搞起来的。“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重建起一套难以逾越的等级制度，这绝非一个礼仪形式问题，它是对革命农民平等思想的背叛。

这股政治逆流，还突出地表现在土地政策的重大改变。这项改变是翼王石达开最先在安庆地区实行的。地主出身的石达开一八五三年秋奉杨秀清之命出巡安庆，下令废止“钱谷本国有”的制度，而改行照原有粮册“每亩输钱米”的“征租赋”制度。这就是照旧保持原先地主统治的土地关系，在此基础上征收赋税。与此相应，他在安庆又广泛收罗地主分子，让他们担任太平天国官职。这些倒退措施，不仅没有遭到杨秀清的反对，反而得到了他的赞赏。杨秀清并联合北王韦昌辉及石达开上奏天王，借口“宜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要求在安徽、江西等地，“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①把石达开在安庆实行的政策推广到各地。“照旧交粮纳税”，就是背离充分体现在《天朝田亩制度》中的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的革命纲领，而倒退到继续保存原有的生产关系。

杨秀清从太平天国革命的一个领导者，变成尊孔倒退的总代表，不是偶然的。

杨秀清出生在一个穷苦的雇工家庭，本人是个烧炭工人。在革命准备时期和太平天国建国初期，他在组织群众和指挥战争方面作出过贡献，成了负责处理日常军政事务的主帅。但他的思想觉悟同他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当冯云山最初动员他参加革命时，他说：“我们这些烧炭人有什么本领图谋大事？但愿求得温饱生活，就谢天谢地了。”大事，就是冯云山所说的“求谋根本出路”，使“千万贫苦人民亦可得救”^②。这个大事，亦即太平天国的革命思想在他头脑里一直没有扎根。他担任领导工作后，又信用地主出身的石达开、胡以晃等人，还重用一批受孔孟之道影响较深的知识分子，这就使他受到孔孟之道越来越多的影响。他信奉“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那套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把自己的意思说成“上帝”的旨意，即“天命”。进入天京后，他居功自傲，竟把自己吹成“具生知安行之资”、“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的救世主^③。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只要这种唯心主义的狂想成为实践的狂想，立即就会暴露出它的有害的性质，它的僧侣的权势欲、宗教的狂热、江湖骗子的行径、敬神者的虚伪、笃信宗教者的欺骗。”（《德意志意识形态》）革命日益向纵深发展，杨秀清所作所为造成的恶果也日益严重。唯心主义的狂想终于转化为极度的个人野心，先前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终于发展为背叛革命的篡权活动。

一八五六年，太平军在几个月内连续打垮了严重威胁着天京安全的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打得湘军连连惨败，曾国藩急得要跳河寻死。安徽几乎全省、江西七府一州五十余县和湖北大片地区，都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这是太平天国军事上的鼎盛时期。就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一八五六年八月中旬，杨秀清托称天父下凡，把洪秀全召到东王府，说：“东王有咁（这样）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又说：“东世子岂止是千岁？”逼迫洪秀全封他们父子都为“万岁”，“且世代皆万岁”^④。在这之后，杨秀清担心洪秀全不能容忍这一野心勃勃的要求，又部署了新的阴谋，准备一旦需要时，便杀害洪秀全，取而代之。

为了粉碎杨秀清的阴谋，洪秀全提出应将加封“万岁”的日期推迟到九月二十三日，即杨秀清的生日，争取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部署。同时，立即分遣使臣，携带密诏，飞召正督师江西的北王韦昌辉和督师金坛、丹阳的燕王秦日纲，火速率兵回京救护。九月一日深夜，韦昌辉率领心腹部队三千人赶回天京，与先期赶到的秦日纲会合，根据洪秀全的命令，迅速包围了东王府，将杨秀清处死。当时，“四面八方欢呼‘赞美，赞美’”^⑤，“一片欢呼诛灭‘九千岁’之声喧腾上下”^⑥。事实证明，杨秀清要尊孔，要倒退，是不得人心的，而洪秀全的措置，则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拥护。

率兵回京的韦昌辉，本来就对孔孟之道那一套颇为熟悉，擅长搞阴谋权术。回到天京后，他违背洪秀全关于杨秀清除外“余党一概赦宥不问”的命令，乘机扩大事态，大肆屠戮，杀了两万多人，被杀者大多是从金田起义以来一直追随革命的骨干分子。韦昌辉还步杨秀清后尘，“俨如狄克推多（独裁者）”^⑦。十一月初，他又率领一小撮死党围攻天王宫，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洪秀全指挥侍卫军及宫内妇女奋勇抵抗，在宫外及天京外围革命军队的配合下，仅仅两天时间，就将叛乱平定。

资本主义侵略者和反动封建统治者早就把希望寄托在革命队伍的分化上。一八五四年，一个美帝分子谈到太平天国时就说过：“照现在形势来看，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他们的胜利，有之，唯内讧而已。”^⑧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杨秀清和韦昌辉正做了中外反动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他们的倒行逆施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都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然而，正如毛主席所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在杨秀清、韦昌辉死后，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两种思潮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它同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结合，仍在继续进行着。

“移民复古风”^⑨，这是石达开搞倒退、分裂的基本纲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左宗棠评论石达开说：“观其所为，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邪教俚说。”^⑩讲的就是他奉行孔孟之道，急于迎合中小地主阶级之心，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之才。韦昌辉被处死后，他被召回天京主持军政事务，竭力主张要有什么“仁义”来平“天下”^⑪，因而与洪秀全离心离德。洪秀全教育他，帮助他，纠正他的错误，他却视作“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⑫，仍一意孤行。一八五七年六月，他擅自离开天京，企图独树一帜，自立一国，利用自己在太平军的地位，欺骗和裹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省近二十万太平军将士分裂出走，给革命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面对着中外反动派甚嚣尘上的反革命气焰，洪秀全毫无所惧。他大胆提拔了在革命战争中迅速成长起来的陈玉成、杨辅清等青年将领，任命坚持革命理想、富有朝气的洪仁玕掌管朝政，经过顽强的激战，先后打破重建起来的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放了苏南广大地区，扭转了险恶局面，使革命重新得到了发展。而在这之后，忠王李秀成又逐渐成了太平天国内部尊孔派的最突出代表。

李秀成在参加太平军前，读过三年孔孟的书，受到封建意识的浓厚影响。参加太平军后，他违反禁读妖书的明令，继续偷偷阅读。在太平天国后期，他成为太平军的一个重

要统帅,在自己王府内的墙壁上竟悬了许多大幅黄缎锦旗,上面写着“中国经书的道德格言”^②。在辖区内,他听任开科取士“出‘四书’题”,纵容反动豪绅重塑孔丘泥像,捧进孔庙供奉,闹得乌烟瘴气。

李秀成奉行的是一整套投降主义政策。洪秀全坚持“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③,而李秀成则大唱反调,鼓吹“礼而恤下”、“依古制而惠四方”、“宽刑以待万方”^④。他对被俘的清朝文武大员礼敬如宾,任用地主分子掌握各级政权,保护地主利益,镇压农民,明目张胆地保护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

对于李秀成这些倒行逆施,洪秀全曾多次提出严重警告。洪秀全一再责备李秀成“忠而变奸”、“自图害国”,几次撤销他的职务,对他宣布,“政事不用尔理”。但是,李秀成不可救药,越走越远,最后象石达开一样投降了敌人,还无耻地向反革命头子们献策,要他们借助孔孟之道,“用仁爱为刀,而平定天下。”^⑤

太平天国内部尊孔与反孔斗争的历史,充分说明了革命队伍内部的尊孔思潮具有何等反动性和危害作用。它代表着倒退、分裂、投降和叛变。它是阶级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政治上、思想上的别动队。杨秀清在前期是有功劳的,但当他开始尊孔、倒退的时候,就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的历史。顺着这条道路开倒车的还有石达开、李秀成,这些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更远了,他们彻底地背叛了革命事业,向封建地主阶级投降,成了可耻的叛徒。至于韦昌辉,本来就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孔孟之道是一切没落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凡是不能与这种反动世界观进行彻底决裂的,迟早难免成为这种反动思想的俘虏,直至离开革命的营垒,撕毁自己过去革命的历史。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以血的教训告诉人们,坚持反孔斗争还是尊孔倒退,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在两大阶级的搏斗中是如此,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中也同样是如此。

① 黄再兴:《诏书盖玺颁行论》

②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八

③ 汪士铎:《汪梅翁乙丙日记》

④ 江夏无锥子:《鄂城记事诗》

⑤ 《贼情汇纂》卷十二、卷七

⑥ 《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

⑦ 《钦定士阶条例》

⑧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附记三

⑨ 《贼情汇纂》卷一

⑩ 《一八五四年六月太平天国东王答复英国人三十一条并责问五十条诰谕》

⑪ 《贼情汇纂》卷七

⑫ 《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调查资料汇编》,第60页

⑬ 《行军总要·序》

⑭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

⑮ 布列门治:《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纪实》

⑯⑰ 麦高文:《太平天国东北两王内讧详记》

⑱ 《天京见闻录》

⑲ 石达开:《白龙洞题壁诗》

⑳ 左宗棠:《与王朴山书》

㉑ 《平定粤匪纪略》卷十四

㉒ 《石达开布告》

㉓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㉔ 《资政新编》

㉕⑵ 《李秀成供状》

韩愈与古文运动

刘大杰

唐代的古文运动，是唐代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政治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是社会阶级斗争在文学领域中的曲折反映。唐代初期，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中小地主阶级作家，已经提出了改革文体和革新文章内容的要求。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到了中唐时期，在文学领域内的这一斗争，也逐步开展和深入，成为一个声势盛大的运动，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家，在为政治斗争服务的过程中，使我国的古代散文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秦、汉的文章，无论阐明哲理，抒发政见，或是记叙史事，都是用的散文。这种散文，通达洁炼，是在适合于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政治斗争以及反复古斗争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为新兴的封建经济基础服务的。如荀况、韩非、李斯、贾谊、晁错、司马迁诸家的散文作品，在思想、艺术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汉、魏之际，文体渐变；迄于晋代，骈俪日兴。陆机、潘岳之作，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都属于地主阶级的上层，利用这种文体，片面追求华辞丽藻，抒写他们的生活和感情，得到官僚士大夫的赏识，一时成为风气。到了南朝，王族地主进一步掌握了政权和文权，在萧统、萧纲、萧绎诸人鼓吹华采、描绘艳情的煽动下，骈风更加兴盛。沈约、王融诸人的提倡声律，在文学语言方面，固然发生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为贵族文人所利用，对于骈文形式的发展，也起了推动作用。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六朝文学，而只是说明：骈文主要是在士族地主的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骈文中也产生过少数优秀之作，如颜延之的《祭屈原文》、鲍照的《芜城赋》、孔稚圭的《北山移文》、谢庄的《月赋》、江淹的《恨赋》等篇，都是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很有特色的作品。但绝大部分的骈文，是朝廷、官府的应用文书，是反映宫廷贵族荒淫腐朽生活的作品。在形式方面，主要是追求华丽的辞藻，堆砌冷僻的典故。正如李谔所说：“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上隋高帝革文华书》）他在这里指出了当时骈文的一般倾向和弊病。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对于华而不实的骈俪文风,很想进行改革,他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通令全国,禁止“文表华艳”。但由于当时作为骈俪文风阶级基础的士族地主还没有受到沉重的打击,所以没有收到什么效果。隋代末年,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对旧的士族地主进行了扫荡。李世民窃取农民起义战争的果实,建立了统一的唐帝国。他进一步推行科举制度,让有才学的中小地主阶级分子,先后登上政治舞台,这就初步打破了过去士族地主在政权、文权上的垄断。中小地主阶级分子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要求改革政治,也就必然要求改革文体和文风。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在中小地主阶层和士族地主阶层的政治斗争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贞观时期,以魏征、李百药为首的史学家们在新编史学书的文学传里,严厉批判了骈俪淫靡的文风。魏征指出:萧纲、萧绎、徐陵他们所倡导的宫体、骈俪一类作品,是“意浅而繁,文匿而彩”。(《隋书·文学传序》)李百药指出当时的文风,“弥尚轮险”,“刑乎流俗”,“俱肆淫声”。(《北齐书·文苑传序》)在这些批判中,反映出他们对于文风、文体改革的迫切要求,成为中唐时期古文运动的先声。魏征、李百药的文章,虽仍多骈体,但很少典故和华词丽藻,大都通达流利,表现出由骈入散的倾向。

武则天当政,长达数十年,她坚决执行法家路线,进一步打击豪族地主,促进了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陈子昂标举“兴寄”,强调“汉魏风骨”,这不仅仅影响于诗歌的领域,对于散文的发展,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他自己用散体所写的许多政论文章,尊法非儒,关心政治,得到柳宗元的赞赏。刘知几是有名的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史论家。他在《史通》里,对于“编字不隻,捶句皆双”(《叙事》)的骈俪文风表示不满。“大抵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自梁氏云季,雕虫道长,……对话俪辞,盛行于俗,始自江外,被于洛中。”(《杂说下》)他这种意见,对后来的古文运动,起了先驱作用。

安史乱后的中唐,代表豪族地主的藩镇、权阉和贵族,相互勾结,操纵政柄,横征暴敛,兼并土地,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在这种紧张的形势下,中下层地主阶级分子,积极要求改革政治,调整地主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以便维护封建政权。政治改革,必然进一步要求文学改革,文学改革是为政治改革服务的。贞元、元和时期,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都得到迅速发展,这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剧烈变化和统治阶级内部政治力量之间激烈斗争的产物。但是,在中小地主中,各派的政治路线仍然是有差别的。特别是中小地主的上层,有些靠近大地主的人,往往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接受大地主的观点和代表他们的利益,甚至向大地主转化,同中小地主的革新派形成尖锐矛盾;反映在古文运动方面,也就形成柳宗元与韩愈的对立,形成革新与保守的对立。

柳宗元是古文运动革新派的主要领导者。他在参加王叔文集团的政治斗争中,总结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创造出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乞巧文》云:“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吮晷飞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沈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溯巨心,使甘老丑。”这表明他对骈文的不满。为了使文章更好地为政治斗争服务,他强调散文的形式。关于散文的内容,他主张“文以明道”。(见《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他所要明的道,是“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

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他叙述自己参加王叔文集团从事政治改革的过程说：“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惩咎赋》）可见他所讲的“道”，不是孔孟的儒道，而是改革政治的法家之道。当然，他这种“辅时及物”之道，仍然是封建之道，是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之道。因此也只能包含一些政治革新的内容，其本质仍然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古文运动中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有其一定的积极作用的。他把文学的内容，归之于“辅时及物”，而又强调对艺术形式不能轻视，这不仅有利于古文运动的开展；更重要的是，使古文运动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走上关心当时的政治斗争、关心反映社会生活的创作道路；因而使柳宗元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成为革新派的代表。

二

古文运动虽是在中小地主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其中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态度和派别。保守派的阶级基础是中小地主上层，特别是那些跟大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有着某种依附关系的分子。他们跟大地主虽也存在着某些矛盾，有时这种矛盾甚至是很激烈的，但从不敢同大地主斗争，其基本态度是为了取得大地主的援助和提拔，他们有时甚至可以按照大地主的要求去攻击中小地主革新派。当藩镇割据、少数民族贵族统治者的侵扰，以及佛道盛行的动荡不安的局面，使他们切身的利益受到某些损害时，他们有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倾向革新派的主张，但绝不因此而改变其依附大地主的基本倾向。为了用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要求，他们也提倡散文。然而正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主要是追随大地主阶层，在思想上的主要倾向，也就是遵奉作为大地主意识形态的儒家之道，他们把当时之所以产生“犯上作乱”和社会动荡的现象，看作是儒家所鼓吹的“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以及“仁政德治”之说失去了统治力量的结果，从而把尊崇儒学，恢复道统，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作为挽救这种局面的主要方法。这就是他们倡导古文运动与原道、征圣、宗经相结合，要用散文来宣传儒道的政治思想基础。等到古文运动取得显著成就之后，一些大地主阶层的作家如李翱之流，也打出提倡古文运动的招牌，参与了古文运动的行列，从而使保守派进一步走向反动。

保守派也有其思想上的先辈。隋末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风暴，有力地冲击儒学的统治。当时的顽固儒生王通看到这种形势，大声呼喊，反对骈文，强调古文，要求文章“志于道”，“贯乎道”，“兴王道”，并且正式提出文章必须“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中说·天地篇》）他要复兴“古文”，也就是要复兴“经文”；他要兴的“王道”，也就是要兴儒道。他这种思想，到了安史叛乱前后，就为尊孔派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柳冕等人所继承，并且加以发挥。柳冕的复古思想最为浓厚，宣传孔孟之道更为露骨。他强调：“经术尊则教化美，教化美则文章盛，文章盛则王道兴”（《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他们这一类理论，对于中唐古文运动的保守

派,发生了不小影响。韩愈跟他们虽有所不同,但他早年即从独孤及、萧颖士等的门人后辈钻研“古学”,正说明他们之间在思想上有一定联系。韩愈关于古文运动,发表了很多类似的意见。他说:

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读书以为学,缙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以为道,文以为理耳。(《送陈秀才彤序》)

韩愈所讲的“古道”,主要是儒道;所讲的“文以为理”,就是要求用文章来宣传其政治主张;他之反对“夸多而斗靡”的骈俪文风,因为这种文体不符合他的政治需要。他的《原道》,正说明了这个问题。“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可见其道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家所反复强调的“仁义道德”。他说:“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养之道”;“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他在这里宣扬了“圣人创造历史”的谬论。“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他强调劳动人民养活皇帝官僚,皇帝官僚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也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永恒不变的真理。要人民服从统治者的礼乐刑政,甘心做统治者的奴隶,就可以天下太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这就是他在《原道》中所宣传的“道”。他说这种道是“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愈想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于儒家圣贤的行列。他在《原性》中,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上性善,下性恶,中性“可导而上下”。他所说的“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正是替封建统治者永远压迫劳动人民制造理论根据。这种观点的反动本质,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如出一辙。

韩愈是柳宗元的朋友,也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但他们在思想方面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在论天、论政和论文三个重要方面,形成对立。简言之:一,柳宗元认为天没有意志,不能赏功罚祸,表现了唯物的无神论。韩愈认为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表现了唯心的天命论。二,柳宗元积极参加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运动,称美王叔文“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韩愈则反对王叔文的政治革新,骂这一集团的人是“侥幸而速进”,“交游踪迹诡秘”(《顺宗实录》);诬蔑他们是“小人乘时偷国柄”,“狐鸣泉噪争署置”。(《永贞行》)把他们斥之为“狐鸣泉噪”,比之为董贤、侯景。并在《忆昨行和张十一》诗中,称王叔文、王伾、韦执谊为三奸。三,柳宗元提倡散文,强调以“辅时及物”、关心国计民生之道为内容,以褒贬、讽喻为手段,体现了文学革新的方向。韩愈则主要以儒学道统为内容,以原道、征圣、宗经为纲,表现了文学复古的道路。这些都是柳、韩之争的原则问题。

韩愈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新唐书》本传云：“愈生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韩愈叙述其兄死后的情况说：“既克反葬，遭时艰难，百口偕行，避地江滨。”（《祭郑夫人文》）又说：“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故舍汝而旅食京师，以求斗斛之禄。”（《祭十二郎文》）所谓“遭时艰难”，是指德宗建中、贞元年间的藩镇叛乱。所谓“百口”，其中大部分当然是奴仆。可见他家原来本很富裕，由于德宗初期藩镇的叛乱，他家的经济情况受到了打击，迫使他“就食江南”。所谓“零丁孤苦”和“求斗斛之禄”，当然有些夸张，但其家业的衰落是可信的。即使如此，他仍当属于中小地主的上层。也正因此，他虽对藩镇割据有所不满，但在政治上的基本态度，还是依附大地主的。他进士及第后，急于求官，三次上宰相书，苦苦哀求。甚至说：“古之进人者，或取于盗，或举于管库。今布衣虽贱，犹足以方于此。”（《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为了要做官，竟以盗贼自比。韩愈在这一方面，从不放松往上爬的一切机会，而其思想、行为的主要方面，终于与豪族地主同流合污。李实是贵族，是著名的贪官，韩愈谄媚求荣，称他为“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公卿大臣。（《上李尚书书》）他在汴州时，又吹捧宦官俱文珍为“俯达人情，仰喻天意”；“冲天鹏翅阔，报国剑铓寒。”（《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后来俱文珍就是迫害王叔文集团的凶手。韩愈在写《论佛骨表》时，似乎理直气壮，但一到潮州，连忙上表求情，并以封禅谏帝。后来又祭鳄鱼，宣传迷信思想。这都暴露了他在政治上依附大地主的基本态度。他后来官做大了，钱也多了。在长安城内买了房子，结构并不小。（见《示儿诗》）在长安城南他还有一所庄园。其《符读书城南》、《南溪始泛》诸诗，就是指的这所庄园。张籍、孟郊、贾岛都去游过，都写过诗。看张籍的《祭退之》诗，可见这一庄园的巨大规模。韩愈不但爱官如命，也爱钱如命。当时官大名大又善于做文章的人，替人撰写碑记墓志，可以拿到很高的稿酬。李肇《唐国史补》云：“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墓卒，造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可见当时官僚士大夫的风气。韦均的儿子积缣帛万匹，想请宰相韦贯之写一篇墓志，没有成功。裴度请皇甫湜写一篇《福先寺碑》，送他很多的车马缿彩，皇甫湜大怒说：我这篇碑文有三千字，每字要三匹。裴度后来只好送他九千匹。这就给韩愈一个谋利的好机会。刘禹锡《祭韩吏部文》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犖金如山。”可见其稿酬之高。韩愈在这方面利用他的官名、文名，在死人身上赚了不少的钱。在他的集子里，留存那样多的碑志一类的东西，原因就在于此。韩愈不但自己爱官、爱钱，对他两个儿子，也大力灌输富贵功名和读书做官的腐朽思想。其《符读书城南》和《示儿》二诗，集中宣扬了这种思想。

韩愈以儒学道统自居，以孔孟之道为封建政权服务，从这点来说，他倡导的古文运动实际是古道运动。这是他的主要的一面，当然是很反动的。但是也要看到，在韩愈思想内部还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其原因是，他毕竟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他虽想依附大地主，但仍然受到某些压制，不能象豪门贵族那样迅速地飞黄腾达，因而同当时的豪族统治集团仍然存在着某些矛盾；对于藩镇割据，他也有所不满。在《守戒》一文里，韩愈对藩镇的跋扈

和残暴，比之于猛兽与盗贼。他说：“今之通都大邑，介于屈强之间，而不知为之备。噫！亦惑矣。……然则如之何而备之，曰：‘在得人。’”他一面反藩镇，同时对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进行了谴责。他在政治生活途中，一上《论天旱人饥状》，被贬阳山；再上《论佛骨表》，被贬潮州。这不能说是完全出于政治投机。另外，他在平蔡州问题上，同具有法家思想倾向的裴度采取一致的态度，而同执行儒家路线的豪州地主代表李逢吉之流，存在着矛盾。“初宪宗将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诸军按视，及还，具言贼可灭，与宰相（李逢吉）议不合。愈亦奏言：……况以三州残弊困剧之余，而当天下全力，其败可立而待也。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执政不喜。”（《新唐书》本传）这说明他是拥护裴度平蔡的。他任行军司马时，也做了一些协助的工作。另外，他还匹马单身，冒着危险，去宣谕王廷凑，这也是事实。

但是，韩愈这种表现都是短时的。如他贬阳山令后，不敢抨击豪族统治集团，反而怀疑怨恨王叔文革新派，贬潮州后，就赶快向最高统治者哀告求情；蔡州一平，在他写的《平淮西碑》里，不去歌颂在这次事件中执行法家路线、并立了大功的李愬，反而大肆赞扬豪门败将韩弘，还接受韩弘送给他的的大笔犒劳。这都是依附大地主的表现。

同他这种政治态度相联系，他在思想上固然开口周公、孔丘，闭口仁义道德，想做孟轲的继承人，但在某些时候，也有少数言论是违背孔孟的，有的甚至对某些法家人物表示赞赏，因而遭到儒家内部对他的责难。站在儒家一边的《旧唐书》的作者，最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一面捧他，一面又不得不承认，“然时有恃才肆意，亦有盪孔孟之旨。”这说明，韩愈并不是醇儒，其言论有一些是违背孔孟的，也就是说，在他的思想中还存在某些矛盾。例如：

一、韩愈有《进士策问十三首》，这是考试题目，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其第五问云：

所贵乎道者，不以其便于人而得于己乎？当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师以尊，四海之内，无不受其赐者。天下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谁与为敌，此岂非便于人而得于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国以强，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为秦，使天下为秦者，商君也。而后代之称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贵其实欤？愿与诸生论之，无惑于旧说。

管仲、商鞅，是古代有名的法家，韩愈对他们的功业表示了赞赏；并叫青年们讨论，特别说明，要“无惑于旧说”。所谓“旧说”，当然是指儒家对他们的指责。孟轲所说的，“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司马迁在《史记·孟子列传》中指出，孟轲所骂的，实际就是主张变法的商鞅和吴起。韩愈在这里，强调不要为旧说所惑，其用意是相当分明的。他把管仲的功业归结为“戎狄以微，京师以尊”；赞美商鞅的措施，有助于秦的统一，使秦国富兵强。其称赞法家和其针对当时政治的现实意义，

十分清楚。同他拥护裴度平蔡的政治态度，也是相互呼应的。

二、韩愈写过一篇《读鹞冠子》。他说：“《鹞冠子》十有九篇，其词杂黄老刑名。其《博选篇》‘四稽’、‘五至’之说当矣。使其人遇时，援其道而施于国家，功德岂少哉！”鹞冠子是战国时由道家转变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韩愈认识到“其词杂黄老刑名”，并且认为按照他的“道”去治理国家，可以建立许多功德，这和他推崇管仲、商鞅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三、韩愈写过《后汉三贤赞》三首，称赞王充、王符、仲长统为后汉的三贤，对《论衡》、《潜夫论》和《昌言》，表示钦佩；对他们的思想和人品，表示景仰。文章也写得简洁明炼，思想上也没有儒味。后汉所谓“名儒”很多，韩愈一概不提，而独赞王充、王符、仲长统这三位富于法家思想倾向的人物，这一点也说明他思想中存在的非儒倾向。宋代的理学家，批评他的《后汉三贤赞》，是“颂非其类”。从上面三点来看，在他的思想中确实某些方面有一定同情法家思想的倾向。

四、韩愈有《石鼓歌》长诗一首，反映出他对孔丘的不敬。石鼓为秦刻石，唐初在陕西凤翔三畤原出土。其形状如鼓，其数有十。上面用大篆刻着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记秦国史事。前人多认为纪周宣王畋猎之事，盖不可信。《石鼓歌》中有云：“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掩揅星宿遗羲娥。”陆游说这里的“陋儒”，就是指孔丘，并且责备韩愈有“言语之疵”。后来有许多儒生出来辩解，说“陋儒”是指毛公，想替韩愈开脱罪责。不管如何，韩愈对孔丘不去秦国，在编诗上有所遗漏，是表示不满的。同时，他认为“二雅褊迫”，石鼓诗有如日月，弃此不收，是取小失大。韩愈虽也说过“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荐士》）的话，但他有时不仅敢于议论“圣人”，而且还要加一点冷嘲热讽。

五、韩愈自认为是孟轲的继承人。孟轲大力辟墨，斥责其兼爱、无父，有如禽兽。韩愈却对此大翻其案。他在《读墨子》文中，说孔丘也是上同、兼爱、尚贤、明鬼的。“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对孟轲的辟墨说表示不同意。后来的儒生如严有翼之流，惊其“乖谬如是”，斥其叛道。

六、避讳是周、孔之法，是儒家必须遵行的礼法。李贺的父亲名晋肃，晋、进同音，依照儒道，李贺应该避讳，不能考进士。韩愈力言其非，作《讳辩》，劝李贺参加进士考试。当时都斥责韩愈违反儒家礼法。皇甫湜说：“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讳辩》）可见在当时这并不是一件小事。从上面的两点来看，说明他在儒家内部确有“离经叛道”的倾向。

七、韩愈鼓吹“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送陈秀才彤序》）但又写了《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等作，这是和儒学背道而驰的，是属于传奇小说一类性质的作品。这一点和他鼓吹的原道、征圣和宗经的文学主旨大有矛盾，从而得到柳宗元的一再支持。柳宗元写过《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赞美《毛颖传》的成就。并在《与杨晦之书》中说：“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侪也。”此为元和五年柳宗元在水州所作。可是后来的儒生，都说《毛颖传》不是“正说”，而是“杂说”；不是儒

学,而是“异学”,加以各种责难。在这些地方,都显示出在韩愈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某些非儒家的成分。在思想上既具有这种矛盾,而他自己又要以孔孟的道统自居,以圣贤自比,当然就要受到宋代正统儒家的批判。二程嘲笑他说:“退之晚来为文所得处甚多。学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却倒学了。”(《二程全书》卷十八)朱熹对他的责备更是严厉,说他“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朱文公集·读唐志》)并且进一步批判韩愈“以文明道”,实际是“弊精神、糜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然今读其书,则其出于谄谀戏豫放浪而无实者自不为少。若夫所原之道,则亦徒能言其大体,而未见其有探讨服行之效,使其言之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同上)朱熹的意思是,韩愈要复兴儒道,实际是背道而驰;主张道文合一,实际是道文分离,而以文为主。在二程、朱熹看来,韩愈是不配居于道统的。

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于韩愈处于中小地主阶级上层,他虽倾向于依附大地主,求官心切,但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倾轧、排挤的激烈斗争的形势下,他的仕途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遭受着大小不同的挫折。他一贬阳山,再贬潮州,风险并不算小。他的思想矛盾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地位和政治经历中形成的。所以当他在政治上受到严重挫折的时候,他思想中的矛盾也就扩大;官位高升、仕途顺利的时候,儒道就占上风。例如,《新唐书》本传说他:“既才高数黜,官又下迁,乃作《进学解》以自谕。”《进学解》是韩愈散文中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不仅语言简炼出色,而且很少道学面孔。所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是合理的意见。其中许多牢骚语言,暗示他对某些现实的不满,也显示出他在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所处的“跋前疐后,动辄得咎”的境遇,以及在其生活上所造成的困顿。他在文章里虽是自宽自解,但也掩不住“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愤懑情绪。他这篇文章,就是在“官又下迁”的环境下产生的,比起他在得意时期板起面孔所写的那些尊儒的文章来,思想感情很不相同。再如他的《张中丞传后叙》、《师说》、《讳辩》、《送孟东野序》、《杂说·马》一类文章,都有其艺术上的特色。这类文章,主要产生在他失意的境遇中,或是出于从政的早期。总之,韩愈虽以儒家道统自居,但由于他的阶级出身,由于他在思想中存在着某些矛盾,并且在仕途中也受到不少挫折,这就使得他在某些时期还能写出少数较好的作品。

在古文运动中,要取得散文的胜利,必得在前人的散文基础上有所因革,建立更富于表达能力的散文语言。在这一方面,韩愈有他自己的成就。韩愈的散文语言,具有规范化与通俗化的特点。所谓规范化,是合于语法的逻辑规律;所谓通俗化,是通达流畅,宜于实用。韩愈的文章,除了《曹成王碑》一类的少数作品外,绝大部分是通达流畅的。因此,他在散文形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柳宗元和刘禹锡的钦佩。柳宗元称赞他的文章:“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刘禹锡也说他“长于笔”。在思想方面,韩愈有错误,柳宗元、刘禹锡从不原谅,总是和他辩驳。但对于他散文形式方面的成就,则加以赞扬。韩愈在散文形式上,提出了改革文体的主张:一是语言独创,一是文从字顺。他对于他的朋友和门徒,反复强调“惟古于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表明他反对模拟古语、强调语言独

创的精神。其次，他又主张文章要写得通达，不能流于艰深。他说：“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认为只有把语言独创同文从字顺统一起来，才能算是好文章。这种意见也是不错的。

最后，要谈一下韩愈对于李白、杜甫的评价问题。中唐时期，以元稹为首，大尊杜甫，大反李白。他说李白对于杜甫，“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见《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想把李白压死。韩愈当时出来，痛击这股歪风。他在《调张籍》诗中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不仅把李白置于杜甫之上，并且诗中所论，主要是在赞赏李白。他认为那些毁谤李白的愚人，不过是摇撼大树的蚍蜉而已。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不是一件小事。李白鄙儒尊法，对儒家传统礼教表示了飞扬跋扈的叛逆精神；杜甫受有较深的儒家思想影响，显示一种因循守旧的态度。他们的诗歌，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宋代开始，杜甫的地位越来越高，评注杜诗的人也特别多。其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杜甫某些体现儒家思想的作品，迎合了封建士大夫的需要，他们对此加以突出和宣扬，以此来提高杜甫的地位。在这方面首开其端的是苏轼。他说：“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王定国诗集序》）苏轼以孔孟的“忠孝”之道的政治标准来推尊杜甫，前人视为定论。一直到清朝的仇兆鳌，称杜甫为“千古以来，一人而已”（《进杜少陵集详注表》），还是苏轼论点的发挥。于是杜甫成为古今诗人之冠，李白受到各种各样的非难和诬蔑。再回头来看看韩愈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那就要高于苏轼一流人物了。

上面的叙述表明，韩愈的主导思想是儒家，但在其思想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非儒家思想的矛盾；同时在其仕途中，也遭受到一些压制和挫折，所以在某些时期，他还能够写出少数较好的作品。加以他在文体改革方面，强调语言独创和文从字顺，经过二十多年的勤学苦练，在散文形式上取得较高的成就。如其《杂说·马》，是一篇寓言式的短文，表示着中小地主阶层在豪族统治集团压制下得不到政治地位的某种悲愤。全篇只有一百多个字，而波澜起伏，一层深入一层。语法严整，通达流畅，表现出规范化通俗化的特征。他的《毛颖传》，富于传奇性，文笔奇崛简洁，得到柳宗元的叹赏。《张中丞传后叙》着重侧面描写，通过一些遗闻轶事，表达出张巡、南霁云的鲜明形象和坚强性格。再如他的《师说》，也提出了一些较好的意见。如“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与儒家传统观念不同。上面提到过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进学解》），也是合理的论点。正由于韩愈写出了这类作品，所以他在唐代古文运动中，仍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对于后代的散文，发生一定的影响。但必须注意的是，他所宣扬的儒家道统、天命论、性三品说，反对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等等，是代表大地主阶级的思想和利益，这是其主要的一面。

向 警 予

施 东 晖

向警予同志，是在毛主席直接教导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女战士，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人。她把年轻的一生献给了无产阶级的崇高事业。

风 华 少 年

一八九五年，向警予诞生在湖南溆浦。

溆浦地处交通闭塞的湘西山区。在那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里，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消息，越过云海苍茫的七百里雪峰山，深深地刺痛着向警予年少的心灵。每当山中薄雾渐渐散去，人们往往看到一个面貌秀丽的姑娘，坐在沅江边的山崖上，朗读《木兰词》：

“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那种少女的征战生活，是何等地引起向警予的神思呵！

十七岁那一年，向警予离开家乡，去长沙读书。沿途看到的“沅水桃花色，湘江杜若香”的景色，并不能减轻向警予的沉重心情。长沙是帝国主义用大炮轰开的一个“商埠”，商店的货架上摆满了外国货。街上到处是操着各种口音的难民，他们是为避军阀混战的兵祸而流落在这里的。这种情形使向警予开始意识到，花木兰式的“英雄”并不能救中国；只有从改造社会入手，中国才有出路。因此，在学校里，她追求新思想，探索新事物，反对封建陋习。在课外，她研究王安石的作品，学习王安石变法的勇敢精神。从这时起，她从一个爱幻想的少女，变成了一个爱深思的青年。

不久，传来了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消息，全国掀起了抗议的浪潮。向警予十分愤怒，她把同学们组织起来，走上社会，向群众作宣传，反对《二十一条》。

在那些日子里，向警予天天忙着出去演讲，既顾不了梳头，也没心思吃饭，面容很快消瘦下去。女伴们心痛地拦住她说：“警予，你得顾到身体呀！”向警予说：“我没有什么。再说，国将不国，我们就是空有了花枝招展般的身体，又有什么意义呢！”说着，招呼着同学们

又出发了。

岳麓山下，橘子洲边，十字街头，向警予站在凳子上大声演讲，愤怒地控诉袁世凯出卖祖国的罪恶，痛切地诉说做亡国奴的痛苦。她声泪俱下，悲愤到了极点。忽然，一阵热血涌上来，她眼前金星乱飞，晕倒在长凳上。行人们深深地感动了，一个个都泪流满面，紧紧地握着拳头。向警予用自己愤怒的火焰，点燃了多少人的爱国热情呵！

被全国人民唾弃的袁世凯，终于倒台。但倒了一个袁世凯，并没有触动根深蒂固的旧制度。接着在长沙发生的一件惊人事件，把向警予的思想又引向一个新的深度。

家住在南阳街的一个名叫赵五贞的姑娘，因为不满意封建包办婚姻，不愿意嫁给古董店的老板，在喜轿里用一把剃刀割断了咽喉，表示了对封建制度的悲壮的反抗！

正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的毛主席，立即在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严厉抨击吃人的礼教，抨击封建制度。向警予读了毛主席的战斗文章，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她从赵五贞的死，想到呻吟在人吃人的旧礼教和封建政治制度下的广大人民，感到这改造社会的事业，真是迫切极了。

这时，向警予已经回到淑浦担任小学校长。她积极地同旧势力展开斗争。当时，妇女们缠小脚，穿耳环，走不摇裙，笑不露齿，只能做男人的附庸，担当不了艰苦的革命工作。向警予就发动妇女不缠脚，不穿耳，提倡男女同校读书，向旧传统发起进攻。

一天，在淑浦街上，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清道夫”——这是当时被人贱视的一种劳动——领头的就是向警予。向警予和学生们每人一柄扫帚，认真地、一下一下地扫着马路。随着马路上垃圾的被扫除，人们脑海里堆积的旧观念的垃圾，也在被清除着。这一天，向警予并没有作演讲，却比开了大会还灵。县城里到处都在谈论着：就连校长也来扫马路，世风确实要改变了！

在遥远的国度里

向警予热烈追求革命真理，很早就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新民学会，直接在毛主席的教育启发下，吸收着革命真理的营养。一九一九年，毛主席组织青年到靠近革命高潮地区的法国去勤工俭学。毛主席写信给向警予，希望她能引妇女外出求学，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向警予立即赶到长沙，筹备成立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不久，向警予就同蔡畅同志、蔡畅同志的已经五十多岁的母亲，以及一批青年姑娘，到了上海。在这里，向警予见到了刚从北京来的蔡和森同志。她如饥似渴地了解北京的新思潮，也向蔡和森同志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理想和抱负。

十一月，她们乘坐法国邮船，离开上海。漫长的旅途，也是一个大的学校呵！你看：

在印度洋岸的许多城市里，劳动人民用一张芭蕉叶露宿街头，苍蝇和蚊子爬满了他们全身，象盖了一层黑布，而远处就是资本家的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芒。

在非洲海岸，黑孩子们用悲切的眼光向旅客讨钱，一些“高贵”的旅客把一枚小钱扔在海里，孩子们就象鱼一样从水底把钱捞起来，还得表示感谢。

向警予看到这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气愤极了，她多么渴望着猛烈的暴风雨啊！

一九二〇年春，向警予到了法国，在蒙达尼女子公学补习法文，并且先在树胶厂后来又到纺织厂做工。当时已经四十三岁的徐特立同志，出国前当过湖南省议会的副议长，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为了学习新思想，他也和青年人一样，在法国的五金店里当学徒，做厨子，同时学习法文。这使向警予受到极大的鼓舞，推动着她更加勤奋、刻苦地学习，认真读着在国内所读不到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六月二日清晨，阳光从密密的法国梧桐叶间射到向警予的窗户上。她已经起床学习许久了。自从来到法国后，在短短几个月里，她就基本上掌握了法语，读完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她还是感到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她独坐窗前，铺开信笺，向远在国内的毛主席表示决心：

“此后驾飞艇以追之，犹恐不及；而精力有限，更不足以展予之所欲，奈何？计惟努力求之耳！数年后，或有以报同志。”

勤工俭学学生们追求马列主义的革命举动，引起了反动的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的恐慌，他们不断地对勤工俭学学生施行迫害。青年们往往没有工作，没有住处，并且饿肚子，只得住帐篷，吃豆饼，许多青年生了病，有的甚至不幸死去。

为了有效地同华、法反动当局作斗争，蔡和森等同志发起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领导组织“工学互助社”，向警予也是领导成员之一。这时她已经同蔡和森结了婚。

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在蔡和森、向警予等领导下，于巴黎咖啡馆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向华、法当局争取“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的决议，并决定第二天举行示威。

二月八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百多名代表，冲到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国公使馆，把公使陈籛包围起来，要他答应大家的要求。

陈籛两手一摊，说：“我没有办法。”

大家提出，要他负责同法国政府交涉解决。陈籛又两眼朝天：“我不管这种事。”

大家火了，连声喊打，几个人上去，把他的礼帽打掉了。如果不是赶来了一批法国警察，把勤工俭学学生冲散，陈籛准得挨一顿好揍。

吃了苦头的陈籛，岂肯罢休。他同法国反动当局加紧勾结，酝酿着遣送勤工俭学学生回国的阴谋。

这年秋天，中国政府在法国里昂办了一所里昂大学，口头上说是专门为了勤工俭学学生办的，但真到了快开学时，却从国内招来了一批富家子弟，而勤工俭学学生却一个也不收。蔡和森同向警予等同志商议，要坚决抗议中国反动当局这种无理行为。他们理直气壮地声明说，办里昂大学的经费，是法国政府退还给中国政府的“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中国要求退还的理由，就是要为勤工俭学学生在法国办大学，因此，里昂大学首先是属于勤工俭学学生的。

勤工俭学学生提出了“争回里大”的口号，组织了一百多人，在蔡和森、向警予、陈毅等同志率领下，由巴黎赶到里昂，浩浩荡荡直向里昂大学走去。

里昂大学的看门人把住了校门，不让勤工俭学学生进去。向警予带领几个女学生走在头里，勇猛地冲了进去。大家就在里边住下了。

陈籛一看机会来了，串通法国当局，给学生们加了个“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第二天，里昂大学附近警车长鸣，被二三百名全副武装的法国警察包围了。

勤工俭学学生紧急集合起来，大家怒目圆睁，守在校门口，坚决不让法国警察逞凶。

骑在马上警官看看进不了校门，一歪头，示意让铁甲车来冲。在铁甲车的冲撞下，铁栅门很快就扭曲了，断裂了。轰然一声，一辆又一辆铁“乌龟”压碎路面，开进校门。

热血在向警予心头沸腾起来，她奋臂高呼：“反对迫害勤工俭学学生！”

大家一起高呼：“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做工！我们要读书！要陈籛出来答话！”

陈籛哪敢露面。这时又有消息说，留在巴黎的勤工俭学学生几百人，正在向里昂赶来。法国反动当局不敢迟延，采取法西斯手段，每两个武装警察挟持一个勤工俭学学生，把向警予等一百零四人死拖硬拽地丢上铁甲车，押进法国兵营，随后强行遣送回国。

轮船又行驶在两年前来时的航线上，沿岸风物依旧，但向警予的心情已经全然不同。她手中有了马列主义武器，感到充实和自信。纵使是大西洋上拍天狂啸的海浪，和南海上空撕碎苍穹的闪电，也不能改变她镇定的神情。

回到上海以后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向警予在上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月，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委员。从这时起直到一九二六年一月出国去苏联学习，她一直担任党中央妇女部部长。

那时，有些妇女受封建礼教束缚，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向警予经常深入妇女群众，同她们谈心。向警予说：

“全中国四亿人口，有两亿左右是妇女，顶了半个中国，妇女不重要？一个社会好比一个人，女权沦落，社会就是半身不遂。妇女起来运动，谁敢道个‘不’字！”

一些知识分子妇女，也起来搞妇女运动，但她们欣赏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上层妇女那一套，热衷于当个女“议员”，所以她们只是少数人在一起开开会，在报上发发声明，同广大劳动妇女结合，不触动反动统治。向警予坚决反对这种资产阶级倾向。

有一次，她听到有人说，湖南和浙江两个省的议会里，出了女“议员”，那里的妇女运动做出了成绩。向警予当即鲜明地指出：

“不对。妇女运动应当是广大劳动妇女起来斗争。如果少数人，只想自己当女官，其结果，不过是无聊的议员席上增加了无聊的女议员，可耻的官僚群中添了些可耻的女官僚，可以说毫无意义。

“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妇女结成的团体，嫌劳动妇女脏，拒绝同女工和农妇站在一起，

所以这种团体，不过是点缀这个万恶社会的一只大花瓶而已。”

在这段时间里，向警予为了解决妇女运动的方向问题，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革命妇女刊物上写了一系列文章。广大妇女深深记住了向警予提出的至理名言：

“政治问题如果不解决，妇女问题是永远不能解决的。”

“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

向警予日日夜夜在劳动妇女中间奔波，她去得最多的是女工集中的浦东、杨树浦、小沙渡的纱厂、丝厂和烟厂。向警予领导开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用马列主义武装工人和妇女，组织她们起来斗争。特别是在工人罢工时，她更是亲临第一线。

一天，南洋烟厂的女工因为不堪资本家的迫害，愤然罢工。向警予穿着用上海农村的“芦蓆纹布”做的衣裳，手里提了一只小饭篮，同女工装束一样，沿着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向工厂走去。

工厂的铁栅门关得紧紧的，里边还上了一把大锁。透过铁栅，可以看到资本家雇佣的两个警卫，戴着大盖帽，打着绑腿，木头一样站在通道口。道口中央一只很高的柜台上，露出一个瘦猴样的工头的脸，猫一样的眼睛闪着绿光。

向警予在离厂门远远的地方站下了，等有工人走来时打听消息。

不多会，铁门“啵啵”拉开，一群女工愤愤然出来，有的在掩面哭泣。向警予用目光向熟人打个招呼，走进人群，边走边谈。女工对向警予说，今天是罢工的日子，但狗资本家用卡车装了打手，把一些力气小的女工硬从家里拖了来上工，中饭也不让出去吃。有的女工还担心孩子在家挨饿，急得直哭。

“资本家有什么新动静？”向警予问。

“今天从厂外运来大批绒毡，说是给工人睡觉，看样子明天再被他们抓进来，就不能出去了。”

“资本家好狠毒。明天你们组织几百名工人纠察队，一早就分到各条马路上去等着，有受骗的工人来上班就动员她们回家去，见到资本家走狗绑架工人上工，就坚决保护工人。”

向警予布置好了烟厂的斗争，又向丝厂走去。那里女工们的斗争热情，也正象缫丝的茧锅一样，滚滚地沸腾着。

在一九二四年这一年中，向警予亲自领导了全市丝厂和南洋烟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她坚毅的神态，富有鼓动性的演说，给了工人们巨大的力量。大家都崇敬她，照她的话去做，因为她带来的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而那也正是劳动人民共同的心声！

永不凋谢的青春

一九二七年四月的一天，在汉口江岸，又一艘从上海驶来的轮船靠岸了，船里下来了大批余惊未定、悲愤交集的人们。他们是从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的虎口下跑到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来的。

向警予也在这时到了汉口。她刚从苏联回国，党分配她在汉口总工会宣传部工作。

向警予一到汉口总工会，就深入到工人中去。这时候，她对于国内情况了解得还不多，她天天同工人在一起，倾听他们的呼声，支持他们的革命要求。

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鼓励汪精卫公开打出反革命黑旗。从七月十五日起，武汉地区陷于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向警予这时从总工会调到省委工作。不久，省委书记罗亦农同志被调走，省委的领导工作就落在向警予身上了。

在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向警予为了使党和工会少受破坏，不顾个人危险，日夜奔忙。她是一个长期公开工作的妇女运动领袖，要秘密工作是很困难的。但她始终带着自信和安详的笑容，出现在工人群众中。

一次，向警予和另一位同志在工人家里接头。事毕，天已黑下来了，远处响起几声爆竹，这才想起这天是农历除夕，有钱人家在那里迎神哩。工人同志说：

“警予同志，你这身打扮，一点不象过年的样子，这样在街上走太危险，在我家换件衣服吧！”

向警予坦然一笑：“工作一忙，把过年也忘了。不过，你放心，我在工人中生活，这里是我的安全地带。”

第二天，向警予换了一件雪青色的长衫，脸上薄薄地敷了一点脂粉，又出门了。有个同志担心地说：

“你这样简单的化妆，瞒不了探狗的眼睛。现在蔡和森同志也不在武汉工作，最好，你也离开武汉，转移到别的地区去吧。”

向警予坚决地摇摇头说：“不！现在斗争这样紧张，这里正需要我。况且组织上没有调动我的工作，无论怎样危险我也要坚持。”

就是这个春节，向警予从早忙到晚，没有顾得吃一顿饭。直到掌灯时分，才在工人家里吃了一点烧饼。临走时，工人很不放心地送她出小巷。向警予对这位工人同志说：“在武汉这样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只要党内没有叛徒，单靠国民党的侦查机关，是抓不到勇敢机智的共产党员的。”说着，就在夜色中消失了。

一九二八年春天，武汉的报纸用大字标题登载了一条消息：“省委书记易陈氏被捕。”还登出了照片。工人们一看照片，都大吃一惊：那秀丽的面容，聪慧的大眼，不正是大家敬爱的向警予吗？可是，往常总是梳得很整齐的头，如今蓬乱着；紧紧抿着的嘴唇，象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工人们不禁涌出了眼泪。

反动派要想抓住向警予，是谋划已久的了，但一直连她的影子也找不到。搞了一次“年关大破坏”，捕了許多人，也还是没抓到向警予。如果不是叛徒宋约龄领了法国巡捕上门去，向警予本来是不会落到敌人手里的。

向警予关进了法帝国主义的巡捕房，并被带上法庭。她瞥了一眼堂上几个头戴黑色方巾的“洋”法官，昂然问道：“这里是中国的土地，请问你们有什么权利来审问中国革命者？！”

法官措手不及，挨了一记“闷棍”，还没有清醒过来，向警予又紧接着逼上去：“你们从远离万里以外的西方，到我们这里来胡作非为，你们倒是应该受审问的。我们搞革命是正

义的事业，而正义的事业是反对不得的，这是历史的结论，难道还需要证明吗？”

说到这里，向警予索性用流利的法语，滔滔不绝地给“洋”法官上起课来了。她说：

“法官先生们：如果您们需要得到证明，请回去读一下法国的小学教科书，看一看法国大革命是怎样惩罚封建统治者的，看一看与人民为敌的路易·波拿巴等等是怎样垮台的。今天，你们已被国内愈扑愈起的革命搞得焦头烂额，却又来压迫中国革命，试问，你们不害怕历史的惩罚么？”

法官被说得哑口无言，反革命的法庭成了向警予宣传革命的讲坛。法国帝国主义没法战胜向警予，只好把她“引渡”给了国民党反动派。

向警予被关进了汉口伪警备司令部的监狱。敌人施行了残酷的刑罚，妄想从她嘴里挖出共产党的秘密。但是，任凭敌人用铁的棍子，木的杠子，也撬不开她紧咬着的嘴唇。

又一个险恶的黑夜，敌人把向警予拖进暗室去加刑。象往常一样，向警予步履坚定地走向暗室。这里有一个院子，院子中间是水池，金鱼在水池里游上游下，怡然自得。在向警予看来，却是十分可怜和可憎。如果生命只能在狭窄的圈子里活着，那种“活”，毋宁死。

她被拖进了暗室……

当她苏醒过来时，看到了暗室里青色的灯光，粘满血和肉的墙壁，心里暗暗庆贺自己又一次战胜了敌人。忽然，她在刽子手狰狞的面孔后面看到了一张熟悉而令人憎恶的面孔，就是那个贪生怕死的宋约龄！霎时间，向警予以惊人的毅力霍地坐起，指着宋约龄骂道：“无耻叛徒，你还有脸站在这里！我为党的事业而死，虽死犹生。而你，活着是条走狗，死了遗臭万年，无产阶级是永远不会饶恕你的，等到革命胜利了，一定把你五马分尸！”

每逢向警予被毒打回到牢房，难友们便急忙给她敷上黄表、鸡蛋和稻草灰，名叫“起板花”，来替她止痛。向警予为了趁活着的有限日子给党做点工作，她在监牢里继续宣传革命道理，鼓励难友坚持革命气节，她还领导大家进行绝食斗争，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

敌人看到从向警予身上什么也不能捞到，决定对她下毒手。他们选择了五月一日这个工人阶级的节日杀害向警予，妄想杀一杀无产阶级的威风。

但是敌人又一次失算了。向警予被绑出来走过街道，她边走边大声说道：

“我是向警予，我是共产党员，反动派要杀死我，可是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长江里漂流着无数革命者的尸体，而井冈山上又升起了革命的红旗。同胞们，起来吧！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敌人慌慌张张地把她推着向刑场走去，向警予放声高喊：

“打倒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高亢的呼喊，震荡在辽阔的中原，震撼着万千人的心。

共产党果然是杀不完的。就在当天深夜，一个共产党员摇着小船把向警予的遗体偷偷地送过长江，埋在汉阳古琴台对面的六角亭下。

萧萧的江风，吹动着亭上悬着的铁马，得得作响，声声不息。这声音，如同战马的蹄声，奔向前方，渐去渐远……

蒋介石上台的头十年

史 锋

千里寻“父”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八日，一艘日本邮船从上海开出，驶向东京。

邮船出了长江口，船身颠簸得很厉害。在上等舱里，传出了象雄鸭叫似的骂声：“他娘的！浪这么大，肚肠都要兜出来。”

寻声望去，只见这人光脑壳、高颧骨、尖下颏、瘪嘴巴，身边带着随从。

这人就是蒋介石。不久前，他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一巴掌把人民打入了血海。四月十八日，宣告“奠都”南京，自己坐了最高宝座。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们的尸体，又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战斗，这使蒋介石感到十分恐惧。这还不算，国民党各派新军阀也都不买他的账，要将他赶下台。而日本支持的旧军阀张作霖也还割据着东北、华北、山东等地。蒋介石一看这个势头，一口假牙咬得格格响。想来想去，一定要有后台老板的有力支持。他决定到日本去一趟，加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同时拆张作霖的台。因此，他于八月十五日宣布“下野”，到奉化“韬晦”了一些日子，就带了张群，行程一千哩，到日本找“过房爷”去了。

蒋介石同张群，都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同日本帝国主义早有勾结。一到日本，蒋介石首先去敲他当年的老师头山满的门。

这个头山满，是专搞中国情报的大特务。头山满很快就猜到他的来意，于是有意殷勤招待，特地借用了大资本家川野长成的精致住宅，来安顿蒋介石一伙。蒋介石很感激日本人看得起他，亲笔写了一幅立轴作为答谢，立轴上是毕恭毕敬的四个大字：“亲如一家”。这个“亲”，是父子之亲还是别的什么，双方心里是有数的。

头山满介绍蒋介石与日本一些政界人物见面。一天，蒋介石从东京赶到日本的著名风景区箱根，拜会正在那里度假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这个田中，刚在上月向日本天皇上了那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是个策划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大阴谋家。

一见到田中义一，蒋介石的身子就矮了半截。他以“谦恭的态度，诚恳的说明了国民革命军实况”。田中对于蒋介石所汇报的中国军情，很感兴趣，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蒋介石看了看田中毫无表情，不禁发急，赶紧进一步表示：

“中日必须精诚团结，共存共荣，此则有待于日本改善对华政策，不可再以腐败军阀为

对象,应以求‘自由’‘平等’的国民党为对象。”

田中微微扬了一下眉毛,蒋介石很快就看出这是田中赞同的表情,不禁大喜,站起身来说道:

“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

田中义一这才笑了,表示同意蒋介石在“与共产党分离、与苏联切断关系”的条件下“统一”中国。

蒋介石在日本的活动,引起了美帝国主义的严重注意。一直隐居在上海静观蒋介石动态的美帝国主义代理人宋子文,也伸长着头颈隔海遥望。美国认为,旧的北洋军阀已经扶不起了,蒋介石倒是件合适的工具,尤其因为他有一块“革命”的招牌,镇压革命比旧军阀更狠,这两点更使美国欣赏。于是美国政府立即通知驻日本大使,与蒋介石进行密谈。

美国大使说:“蒋先生回国以后,如果有意于重返政府,可以期望得到美国支持。”

蒋介石回答说:“困难还不少。如能给以支持,将能获得忠诚的报答。”

美国大使又说:“宋子文先生也愿意支持蒋先生,具体细节还可以进一步研究。”

蒋介石得到了两个老板的进一步支持,喜出望外,立即动身回国。十一月十日,他回到上海,宋子文也在同一天由汉口赶来。两人在密室中商议了大半天,正式把关系搭上了。

接着,显然在美国的导演下,上演了一幕人间罕见的“喜剧”。十二月一日,也就是蒋、宋密谈后的第二十天,蒋介石同宋子文的妹妹、司徒雷登的干女儿宋美龄,出人意料地在上海结婚。蒋介石这时已经四十一岁,而宋美龄却还只有二十五岁,据说又是同别人订了婚的。这样的两个人居然会结合在一起,与其说是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毋宁说是蒋介石嫁给了美国,更能说明这件事的本质。

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回到南京,重新登台;宋子文则做了他的财政部长。

这时候的蒋介石,感到腰板比先前硬了不少,决定继续打出“北伐”的旗号。但当他环顾中原,看见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敌手时,心里又不禁恹恹起来。他想,要独霸中国,光有政治靠山还不够,还必须有个精神“靠山”,孔老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一套,倒是可以作自己的精神支柱的。因此,他在“北伐”途中,专程跑到曲阜“朝圣”去了。

这天,蒋介石来到孔庙大成殿。他卸下黑大氅,交给随从副官,然后整整衣冠,登上台阶。一行人穿过张牙舞爪的雕龙石柱,屏息凝气地进入大殿。大殿里黑洞洞、空荡荡、阴森森,一股陈腐气息扑鼻而来。在布满尘网的孔老二神龛前,蒋介石摘下大盖帽,眼观鼻,鼻观心,深深地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这才仰起头来,从雕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字样的牌位后面,瞻仰了一番那个头戴冕旒、捧着玉笏的孔老二。接着,蒋介石又参见了大殿两侧供奉着的孔老二那班徒子徒孙的丑像,他深感“吾道不孤”,十分兴奋。

这一伙又去观摩历代皇帝给孔老二评功摆好的“御碑”。蒋介石不禁用手杖把地皮戳得咚咚响:“也应该给我在这里立一块碑,大书孔子乃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要完成反共大业,端在孔子思想之复活……”

正说得顺口,突然,一条长长的冰凉的东西落在他脸上,吓得他一缩脖子。一看,原来

是晾在树上的一块士兵绑腿布掉了下来。蒋介石大怒：“这简直是亵渎圣地！”当即命令跟随在身边的刘峙，严禁在孔庙驻兵。

由于大触霉头，蒋介石悻悻而去。他从“绑腿布事件”中深深感到，不敬孔圣人的军队，不能与共产主义作战。“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道德智能”不可。

受到了“终身的刑罚”

蒋介石离开曲阜，继续“北伐”。这次“北伐”，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的革命意义，只不过是新旧军阀之间的争夺战而已。等到“北伐”结束，蒋介石同各派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又发生了，光是一九二九、一九三〇两年，就先后发生了五次大混战，造成千里荒芜、遍野遗尸，人民遭到严重的灾难。由于蒋介石控制着国民党中央政府，占据着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富庶地区，又有着帝国主义和江浙大财阀的支持，他终于一一击败了对手，暂时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

蒋介石掉转头来，全力对付共产党。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次年四、五月，他两次发动了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可是都遭到了失败。

到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一次，他起兵三十万，亲自担任总司令，身边还带了一批德国、日本、英国军事“顾问”，扬言“三个月肃清江西共军”。

蒋介石坐镇江西，宋美龄在南京闲得发慌，跟到了南昌。蒋介石自以为这次“剿”共，一定能大获全胜，兴致勃勃地带了宋美龄去“欣赏”夜战景色。一天，他们趁着天黑，溜进了上官云相部队的驻地。

不料，这天深夜，突然在近处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红军一似天兵天将，插翅飞到了离这里不远的莲塘。上官云相部队仓皇应战，乱成一团。蒋介石和宋美龄这时再也没有心思欣赏什么夜战了，吓得面如土色，宋美龄更是丧魂落魄似地扯住蒋介石不放手。蒋介石几次想拔枪先打死宋美龄，然后再了结自己，但听听枪声似乎远了一些，就又把手枪插回腰间，恨恨地骂：“混蛋！上官云相躲到哪里去了？”

上官云相这时正蹲在壕沟里躲红军的子弹呢！他的一个师差不多全完了。

蒋介石虽然保住了性命，可是他的部队共损失三万多人，丢枪两万多支。军官们个个垂头丧气，连他的亲信将领陈诚也发出了悲叹：“与红军作战，无异是一种终身的刑罚，这是没有希望的。”第三次“围剿”就这样凄然收场。

这时，另一件事又使他大伤脑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几千里江山沦入敌人手中。全国人民怒火万丈，要求抵抗。而蒋介石却执行其美国主子的命令，亲自下了要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九·一八”事变前，美国就向日本保证：“不与闻满洲事变”，想以牺牲东北来保住关内的殖民利益。“九·一八”在蒋介石心里引起的烦恼，是人民要求抗日，使他不能继续“剿共”。

果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反蒋浪潮。十一月初，平、津

两地的学生代表赶到南京来请愿，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云集。群众包围了“国民政府”，大家齐声高叫，要蒋介石出来说话。

好半天，从“国民政府”的大门里，开出来一队杀气腾腾的士兵，守在两旁，枪栓拉得哗哗响。蒋介石披着黑大氅，缩在士兵身后。

学生们一见，就喊起了口号：“还我东北！”“反对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哭丧着脸说：“你们要抗日，我也想要抗日。我好比‘岳武穆’，‘岳武穆’要‘北上抗日’，只因为后方不‘统一’，所以还不能抗日。”说完，一转身就溜了。

群众十分气愤，情绪越来越激昂。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小心翼翼地把这情况告诉蒋介石：“看来，得讲几句话给他们听听，不然，怕众怒难犯吧！”

蒋介石无奈，只得又跑出来，装得慷慨激昂地说：“我保证三年之内收复失地，如果三年后失地不复，当杀我头以谢天下。”

学生们知道蒋介石一贯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人，便决定来一个“顺水推舟”，发起了一个“欢送蒋介石北上”的运动。

第二天早晨，两万多学生结队聚集在“国民政府”门外，蒋介石躲在里面，不敢露一露面。这天，气候骤寒，冷雨飘飞，学生们在凄风苦雨中喊着口号，站了整整一天一夜，又是愤怒，又是冻饿，不少人倒在地上。

而蒋介石却在生着暖气的办公室里读着大刽子手“曾剃头”曾国藩的书，向这个前辈师父叩教屠杀人民的秘诀，诸如保甲、民团、储粮、作战等等。当读到“末索三日”、“大索十日”时，蒋介石不禁如获至宝地叫起来：“妙！曾文正公用‘大索’来刺激士气，是好主意，江西剿共，一定推广。”

正想得得意，忽然传来一阵“咣咣”的紧急钟声和震天的口号声，把蒋介石吓了一跳。他走到前楼，从窗帘缝里望出去，只见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抡起大棒敲钟，边敲边喊：“不出兵抗日誓不离开国民政府！”

蒋介石只好再出去应付一下。侍卫们把他扶上一张桌子。不知道是害怕桌子不稳，还是心里紧张，蒋介石的两条腿不停地颤抖着。他结结巴巴地说：

“三天，三天以后，我就宣布出兵，嗯，抗日。”

群众高叫：“口说无凭，要亲笔签字！”

蒋介石连声答应：“好、好，我回去写。”

蒋介石回到办公室，提起了毛笔。他没有签名抗日，却给戴笠写了一张“手谕”：

“雨衣，速来。”

戴笠是个什么人？蒋介石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张字条呢？

“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

戴笠，字雨衣，是蒋介石在黄埔军校中培植起来的反动分子，反动的“孙文主义学会”

骨干成员。从一九三〇年起，他就干起特务勾当来了。最初，他搞到一些有关共产党和进步分子的情报后，就亲自拿着，从蒋介石住处的后门进去，钻进厨房，交给传令兵，要传令兵转交给蒋介石的机要主任。不管有没有反应，每隔三、四天总送一趟。机要主任看到偶而有一、两份稍有点意思的，挑选给蒋介石看。蒋介石看了几次，认为戴笠还有些用处，批给了他一点活动费，于是他开始雇人搞情报，情报的质量也“高”了一些。慢慢地，他就成了特务头子。

这一天，戴笠应召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一看在座的还有康泽、贺衷寒、邓文仪等十来个蒋在黄埔军校的“大弟子”。一会儿，蒋介石出来了，哭丧着脸诉苦：

“现在日本人压迫我们，共产党又这样捣乱，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了！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呀！”

在座的这些人，原都是他的得力爪牙，可这回却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不开口，也不知怎么开口，蒋介石也不叫大家开口，就宣布散会了。

隔了三天，蒋介石又把这些找来，把上次会上的话重复说了一遍，讲完了，会也就散了。“大弟子”们苦苦揣摩，总不得要领。最后还是贺衷寒说：“恐怕是老头子（指蒋介石）要大家组织一个什么团体吧？”大家也若有所思地说：“对，可能是这个意思。”

又隔四天，蒋介石第三次把这些找来，刚说到“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这一句时，贺衷寒决心冒险试探一下，就站了起来，挤出几滴眼泪，吞吞吐吐地说：

“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

蒋介石一听，有点苗头了，想不到这些不中用的学生还有点用，就透露一丝口风说：

“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吵翻啦，啥？好吧，你们就试试看。我想，我们要有一个象法西斯那样的组织。你们再想想吧！”

就这样，一个秘密组织就由酝酿而筹备建立，取名“复兴社”，它由蒋介石身边最疯狂、最凶恶的爪牙为骨干，提出了“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的口号，从而在国民党内，掀起了一股法西斯的新狂热。蒋介石特地派了他的儿子蒋纬国等一大批人，去德国学习法西斯主义。蒋介石还手书“攘外必先安内，安内必先剿匪”两句，作为复兴社的政治纲领，妄想以最黑暗、最凶残的法西斯主义，把国民党这具腐尸“复兴”起来，加强他个人独裁的反革命统治。

蒋介石为了反共反人民，另有一个特务组织名叫“C·C·”，以大党棍陈果夫、陈立夫为首，参加的多数是党棍、政客、流氓及堕落的知识分子，内部还有一批职业特务。

蒋介石依靠C·C·（后来叫“中统”）和复兴社（后来叫“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实行法西斯特务统治。在整个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统治区到处是监狱，遍地皆屠场，无数革命者和无辜群众被绑架、殴打、监禁、暗杀。一九三三年夏天杨杏佛的被杀，就是这数不清的血案中的一桩。

杨杏佛是个进步人士，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因而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担任副会长和总干事。这个组织经常援助被蒋介石反动政府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蒋介石对它十分仇恨，但因为宋庆龄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

不敢对她下毒手，就决定要戴笠杀掉杨杏佛，借此警告宋庆龄和“同盟”的其他领导人，妄图阻止他们的进步活动。

杨杏佛住在上海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中央研究院的楼上。他喜欢骑马，每天早上要到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中山路(今中山西路)一带驰骋。戴笠原定在那个地方下手，因为机会多，有把握，但是蒋介石认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以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胁宋庆龄的目的，又会增加自己的麻烦，怕各方面强烈要求破案时不好办，所以指定务必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今香山路“中山故居”)附近执行。戴笠只好照办。那儿正好离中央研究院不远，便在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

负责执行暗杀任务的一共六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便成仁”，如果被捕，要立即自杀，绝对不得泄露。暗杀时间原定六月十七日早晨，特务们乘了一辆轿车前往，在离研究院不远处下车，伺机下手。但那天遇到有法租界的警车巡逻，没有动手。第二天早晨又去，正当杨杏佛下楼，坐上小汽车，特务们就一拥而上，集中开枪，当场将杨和司机杀死。

达到目的后，特务们拼命奔向自己的汽车。有一个特务在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到折回来，汽车已经开了，那特务狂叫“等一等！等一等！”这时附近警笛已响，车上的特务行动组长不敢停车，又怕那个特务被巡捕抓去泄漏秘密，就拔枪向他射击，不料没有打中要害。汽车开足马力逃走，被打伤的特务由巡捕送往医院抢救，当天下午就能开口说话。戴笠害怕他说出真相，指使一名混在巡捕房里的复兴社特务分子，用毒药毒死了这个“倒霉”的爪牙，灭了口。

在那暗无天日的岁月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党员都先后牺牲在蒋介石的魔手里。仅据一九三二年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记载，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约有四十五万人被蒋介石法西斯专政所杀害。从一九三〇年八月到十月，蒋介石又杀了十四万人。在雨花台畔，在龙华荒郊，烈士的鲜血，凝成红色的雨花石。

蒋介石还把他的法西斯特务派到红军里面来。他对喽啰们说：“如果你们能冒险，给红军俘虏去，成功的好机会便到了；可以用他们的手枪打他们的军队，可以里应外合；如果精干一些，能到他们司令部去做事，就更好了。”还强调补充一句：“这不是书本上可以找得出的，希望你们切切实实地接受。”

可惜，蒋介石的这个“不是书本上可以找得出的”祖传秘方，救不了他的命。用几名特务怎能搞垮红军？就连他派去进攻红军的五十万军队，这时候也正被红军打得抱头鼠窜，向抚州狂奔呢！

“仁者‘杀’人”

蒋介石急急忙忙赶向抚州，去收拾第四次反革命“围剿”失败的残局。

这是一九三三年四月初，他刚从北平回来。他去北平前，红军全歼了陈诚手下的两个师，其中五十二师师长丧命，五十九师师长被俘。在北平时，又听说红军全歼了肖乾的一

个师,其余的部队都急急朝抚州败退。

蒋介石一到抚州,就召集将领“训话”,叹息道:“这回官长死亡之多,是自我带兵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我自当参谋,一直到现在,打仗从来没有这样的失败过!”他又说:“中国的大患,不在东北而在江西。所以我虽然是到北方去了,却一刻也不曾忘记江西的‘匪’患,更不曾忘记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失败的惨痛!”

从这时起,蒋介石又着手准备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他拚命给部下打气说:“仁义之师一定可以打胜仗。仁者爱人,仁者无敌。”这种虚伪的“仁爱”说教掩盖不住他的法西斯面目,因为他同时又下令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设立地方保安队,派遣大批特务潜入红色区域进行破坏,并实行“经济围剿”、“交通围剿”,严禁粮食、布匹、食盐、煤油、药品等运进红色区域,想把红区人民统统困死。

九月底,一切准备就绪。红区周围,大小碉堡林立,一百万军队分四路压境而来,二百架飞机挂上炸弹,升火待发。十月二日,蒋介石又一次把带兵官召来,呲牙咧嘴地说道:

“要拿快刀斩乱麻的精神,想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用快刀斩乱麻的人材”来消灭红军;“我们做上官的人,一定要做快刀斩乱麻的上官,做部下的一定要去做快刀斩乱麻的部下。”“我就是一个快刀斩乱麻的统帅,现在要找的将领,就是要找快刀斩乱麻的将领!”

蒋介石一口气说了一连串的“快刀斩乱麻”,赤条条地连“仁”的外衣也顾不得披了。

蒋介石倾其全力孤注一掷。红军英勇作战,奋斗一年,终于因为王明机会主义者排斥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使红军不能打破敌人的围攻。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气壮山河的长征。

蒋介石反动军队带着地主还乡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他们残酷地屠村、搜山、烧杀,八十万群众死在敌人的屠刀下,红区满目凄凉,到处是残垣瓦砾,遍地是断肢遗骸。反革命屠夫们在写给蒋介石的邀功信上,得意洋洋地写道: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阉阖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这就是蒋介石的“仁政”!

然而,在这同时,蒋介石却在白区,把鼓吹行“仁”的孔老二的偶像,吹吹打打地抬着游行,导演着一出恢复旧礼教的闹剧呢!

复古的闹剧 历史的笑柄

闹剧是在蒋介石“剿”共行营所在地的南昌首先揭幕的。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南昌市内各条主要街道上,秦命扎起牌楼,挂上彩灯,电线杆上歪歪斜斜地贴着标语,一辆辆宣传车在马路上东冲西撞,整个南昌城充满了实行“新生活”、恢复旧礼教的聒噪喧嚣。

一会儿，街上稀稀拉拉地走来了一队被强迫参加的游行队伍，他们横七竖八地捧着写有“明礼义”、“知廉耻”、“谦恭和服从能使一切顺利”等字样的标语牌。更“精采”的，居然有人穿戴着古代衣冠，化装成孔老二，夹在行列中蠕蠕移动！

这就是蒋介石推行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的一幕！

蒋介石搞“新生活运动”，是他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妄想用孔孟之道麻醉和欺骗群众，抵销共产主义思想在人民中的强大力量。

一个月前，蒋介石在南昌宣布“新生活运动”正式开始时，大讲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新”花样。据他说，因为中国人懒惰、散漫、萎靡、污秽，一般国民道德都很低，不“整顿”不行。尤其使他恼火的是，有一天，一个老百姓居然不肯给他这个“委员长”的汽车让道，太岂有此理了。讲到这里，蒋介石上了火，他破口大骂了：

“中国人不好完全算人，中国人无论衣食住行，都不能如同我们的古人或现在的外国人一样合乎礼义廉耻，由这一点就可以晓得我们的民族不行！”

于是，法西斯主义披上了“新生活运动”的袈裟，巧妙地、照样是疯狂地镇压人民群众。许多城市，都按照所谓南昌“新运总会”所发出的“凡违抗新生活运动者着游街示警”的命令，把大批无辜群众押上街头示众。所谓“新生活”，依然是人民的旧地狱。

孔老二这具政治“木乃伊”，在“新生活运动”中更加红得发紫。蒋介石吹捧孔老是“万世师表”，“第一伟人”。私生子孔老二极不光彩的生日，居然由蒋介石反动政府下令作为“国定纪念日”。孔老二的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受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当上了部长级的“特任官”。

南京孔庙的祭孔排场，不用说是更大了。洙水桥前，拥满了穿着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的文武百官；大成殿上，香烟缭绕。可是，煞风景的事同时发生了。原来，这年又闹灾荒，大批衣衫褴褛的难民流入南京，沿街求乞。这一天，看到孔庙前华盖如云，大官如毛，就都拥了来。反动政府认为他们衣服钮扣没有扣上，违反了“新生活运动”的“准则”，要把他们赶走。难民们流离失所，饿穿肚肠，衣衫早已破烂，钮扣哪里扣得上！他们索性把破衣裳脱下来，赤膊行走，以示抗议，弄得反动军警哭笑不得！

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遭到了人民的无情嘲弄和唾弃，成为历史的笑柄。所以，当“新运”两周年时，蒋介石哭丧着脸说：“新生活运动自创始以来，就一般的成效和实际情形来说，实在不能满足我们的期望，简直可以说是退无进。这是很可痛心的，很可惭愧的！”

孔孟的幽灵，失“灵”了！

但是，蒋介石是不甘心失败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他蓄谋着新的反共勾当，为此他甚至不惜出卖主权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把中国进一步引向了民族灾难的深渊！

批判苏修社会主义

撤销入党介绍，行吗？

——读苏修短篇小说《入党介绍》有感

任 犊

“我要撤销我对你入党所作的介绍。我要把我这个决定通知区党委”——在苏修短篇小说《入党介绍》的高潮，老工人阿拉海尔强按住内心的愤怒，对他过去的徒弟、今日的厂长鲁胡拉说了这段话。

是什么原因使阿拉海尔如此大动肝火？我们不妨先观察一下他们争吵的地点吧。

这是鲁胡拉的家，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座高质量的新房”。阿拉海尔一进门，就不禁目瞪口呆：“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华丽的家具和那么多精致的玻璃器皿。这些器皿都装在一个漂亮的小橱里。”这个家，“真是要啥有啥”。但是，如果认为这是鲁胡拉的全部家产，那未免太小看了他。在纳尔达兰他还有一所阔气的别墅：“那是一栋用白方石块盖的高大的二层楼房。楼房四周是高高的石头围墙。院子里有葡萄园、花园、养鱼池……是个真正的地主庄园。”请不要误会，这不是果戈里、谢德林、屠格涅夫笔下那些吸农奴血的贵族的庄园，而是今日苏联一个号称“共产党员”的厂长的私有财产。

鲁胡拉竟然如此富有，难怪阿拉海尔会奇怪地发问：“你的工资是多少？”鲁胡拉不加思索地回答：“二百五十卢布”。且不说这个数目比普通的工人已多出了好几倍；单凭这些工资，鲁胡拉岂能置办偌大的家私？若要了解此中奥妙，还是到厂里去一下。请看：上个月车间装配了七百二十二台发动机，出厂产品统计表上却只有七百台；“是统计员给搞错了”吗？一个月后，依然如故，“总往一面错，总是往少里错”。这些发动机怎么不翼而飞了？喂，轻声点，这可是秘密；它们“都让人家从后门卖出去了”。鲁胡拉别墅的水井里安装的发动机，不就是其中之一吗？鲁胡拉是厂长，他不仅有权支配厂里的工人，而且有权支配厂里的产品。“权”和“利”就是这样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有权，就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把社会财富攫为己有，就可以榨取工人的血汗塞进自己的私囊。阿拉海尔和鲁胡拉的关系完全变了，已经由原来的师徒关系，转化为雇佣关系。阿拉

海尔已经沦为替鲁胡拉厂长创造剩余价值的雇佣奴隶了。

鲁胡拉虽然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实际上是个彻头彻尾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他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禁想起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谈到什么是阶级时说的一段话：“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揭穿鲁胡拉的发财秘密，便可发现无论在所有制关系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还是在分配关系上，他都同工人处于尖锐对抗的地位。鲁胡拉所统治的这家发动机厂，名义上还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已变成鲁胡拉的私有财产。他掌握着生产资料，掌握着产品的支配权，工人根本没有“份儿”过问；他对工人，完全是吆五喝六，居高临下，就连他当年的师傅阿拉海尔要见他一面也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在办公室外，阿拉海尔等得“打起瞌睡来了”，然而得到的却是一声女秘书的官腔：“厂长今天不能接见您”；好吧，那就上鲁胡拉家里去吧，但也没看到好脸色。鲁胡拉一会儿坐在安乐椅上，“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趾高气扬，满口官腔；一会儿，又“猛地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象头发疯了的恶狼似地咆哮：“是谁给你权力让你用首长的腔调和我谈话的？”在他的眼中，只有“首长”，也就是他上头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才有和他谈话的权利；至于工人，即使象自己的入党介绍人阿拉海尔，现在也不过是“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而已，连谈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这不是一副道道地地的资本家的狰狞嘴脸吗！

于是阿拉海尔发怒了，决定“通知”区党委，撤销原来的入党介绍。然而，撤销入党介绍，行吗？作者告诉读者说，行。在他的笔下，阿拉海尔一宣布这个“决定”，一分钟前还是那么张牙舞爪的鲁胡拉顿时“神色慌张”，举止失措，阿拉海尔也就“轻松”地走下了台阶。要对付这样的官僚资产阶级分子，真是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已经复辟的苏联，“区党委”这个概念只意味着比鲁胡拉高一等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而已。官官相护，大官们自有一套对付工人的王法。可以设想，即使阿拉海尔上告到莫斯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勃列日涅夫，也“轻松”不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修正主义的党，资产阶级的党，法西斯党。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这些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纵容和庇护下，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变社会主义所有制为走资派所有制，变社会主义经济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假借“国家”的名义，肆无忌惮地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果实，骄奢淫逸，作威作福，比资本家还厉害。如果不触动造成鲁胡拉的社会制度，不推翻他的总后台、总头目、总代表勃列日涅夫集团，仅仅向他们通知

撤销入党介绍,不就等于向恶狗的主人告恶狗的状吗?

作者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故意隐瞒鲁胡拉为非作歹的社会根源,而让阿拉海尔把一切都归之于自己“看错了人”,并让他认为“对这件事我要负责一辈子”。其实,鲁胡拉在十五六年前,虽然不能说是觉悟很高的青年,但毕竟是个工人呀!怎么能让阿拉海尔看到他十五六年后的样子,并对此负责呢?鲁胡拉是变了,从十年制学校毕业后进工厂,经过满师——提级——入党——获得工大夜校毕业证书——厂设计科工程师——共和国机器制造业管理总局科长这样“步步高升”、“飞黄腾达”的道路,又重新回厂做厂长时,才成为骑在工人头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他的地位的每一步高升,即职权的增大,都意味着能够享受的特权的扩大。你看,他当工人时,只是“住在一个小胡同的一所旧房子里”,一当厂长,马上就建造起私人别墅,调动厂里的工人为自己服务。那些建筑材料哪儿来的?可想而知,还不是用发动机去开后门同其他的厂长们交换来的。只要钻进修正主义的“苏联共产党”内,官做得越大,就越有条件明目张胆地巧取豪夺,搜刮民脂民膏,而且都披着“合法”的外衣。鲁胡拉的阶级地位变了,已经从工人阶级中的一员挤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为他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根本不能用个人的品质来解释。如果一定要说谁“负责”的话,那就是要勃列日涅夫集团负责。因为鲁胡拉的变化,只不过是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一种结果。作者大肆宣扬撤销入党介绍,不过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为罪魁祸首勃列日涅夫集团涂脂抹粉而已。

鲁胡拉的变化反映了整个苏联社会的根本变化。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曾经殷切地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当时“十五岁的这一代人”身上,指出他们终生的全部任务是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经破坏了的旧社会的废墟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五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十五岁的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七十岁左右的了,他们中的小部分人正掌握着苏联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权。正是他们背叛了伟大的列宁,施展种种阴险狡诈的手段,发动了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变。列宁如能亲眼看见这个历史的悲剧,一定会再次愤慨地重复德国诗人海涅的一句话:“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同是“跳蚤”,他们和鲁胡拉这一代却是在两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如果说,鲁胡拉他们是在已经复辟了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苏修社会中,主要依赖资产阶级特权而被培育出来,那么,勃列日涅夫这一代“跳蚤”却是在“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凭借扩大了资产阶级法权而产生的。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产生新资产阶级“跳蚤”的孳生地。因此,为了俾苏联的悲剧不在中国重演,为了使列宁的希望继续在中国得以实现,我们必须永远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定不移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跳蚤”所赖以生长的土壤。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永远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人民群众手里。

高尔基在准备创作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时,曾向列宁谈过作品的构思,想描绘一个从农民出身的资产阶级的家庭发展史。列宁以为关键是怎样写出结局。根据列宁的思想,高尔基在作品中给予了阿尔达莫诺夫一家最后被人民革命所推翻的可悲下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自己会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作出应有的结局。我们

坚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附：入党介绍

作者（阿塞拜疆）古谢因·阿巴斯扎捷

（载苏修《星火》杂志 1975 年第 7 期）

阿拉海尔把葡萄藤往凉台上拉的时候，突然那条细藤发出一声清脆的折断声，就象飞鸟的一只被折断的翅膀一样，无力地在空中倒垂下来。老人伤心地叹道：“真倒霉！”去年春天，他在门前台阶旁栽了这枝葡萄藤，精心地把它圈了起来，耐心地等着它伸藤、爬蔓，一直爬上二楼的凉台。那时，阿拉海尔幻想着葡萄蔓缠满圆柱，再顺着扯起的绳子爬去，直到绿叶成荫覆盖凉台。这样，在炎热的夏日便可以在绿荫下乘凉品茶了。

这下子，由于他自己不小心，把葡萄藤拉断了。现在只好耐心地等它长大，重新爬上凉台了。那根拉断的葡萄藤还有一层薄皮连着。老阿拉海尔把它扯下来扔到院子里去了。他把绳卷放到一边，疲倦地坐到椅子上。

他的心在阵阵作痛。工作中上点火，就会这种样子。他一点东西也不想吃，甚至都不能把葡萄枝好好系上，而且还要心痛。

他吃了一片药，又在凉台上坐定。这个凉台面朝着一个宽敞的大院子。

看来，他是摆脱不了今天工厂里所发生的这件事了……

这件事也真让人不愉快：老阿拉海尔从来还没有认错过人。正象人们常说的那样，他有一副好眼力。但是现在他却不得不痛心地承认，他认错人了……他认错的这个人，是他阿拉海尔最喜欢的徒弟，当年他曾为这个徒弟的成绩感到骄傲……

院子里传来一阵阵喊声。阿拉海尔不由自主地从凉台上往篮球场上望了一眼。那里正在进行着一场篮球争夺战。一个瘦高个子的小伙子截住飞来的篮球，飞速运球上篮，把球投了出去。投篮不中，球碰板撞了回来。围在球场上的小观众们齐声发出惋惜的叫声。

阿拉海尔看看这个年轻的篮球运动员，心里想到：“鲁胡拉刚到我们厂来的时候，也是这么个瘦高个子，这样灵巧……长着一双敏锐的眼睛……”

这已经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一天早晨，装配车间主任领着一个满头松软黑发、身材细高的小伙子来到阿拉海尔跟前说：“师傅，给你送来一个徒弟，他叫努鲁拉耶夫·鲁胡拉。十年制学校毕业了，想参加工作。您就把他培养成一个好钳工吧。”

阿拉海尔师傅挺喜欢鲁胡拉，因为他头脑机灵、动作灵巧、干活认真。过了不长时间，阿拉海尔宣布说，这个徒弟可以独立承担工作了。大家都知道，师傅说话是算数的。鲁胡拉满师定了级，很快又被提了级。过了两、三个月，他已成为一名优秀装配工了。车间的光荣榜上还贴出了他的照片。

阿拉海尔看到自己的徒弟迅速获得的这些成绩，当然是很高兴的。当鲁胡拉请求师傅介绍他入党的时候，师傅满心高兴地同意了。他毫不犹豫地写道：“我相信，努鲁拉耶夫·鲁胡拉一定会自己的工作成绩和模范行动光荣地证明他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崇高称号。”

鲁胡拉不脱产念完工大夜校，获得了毕业证书，并转到工厂的设计科工作。在这里他也表现出他是一个精明的工程师。又过了三年左右，他被提拔到共和国机器制造业管理总局机关工作。

又是几年过去了。阿拉海尔已经很少看见自己这个过去的徒弟了，但是听人说，他在局里步步高升，当上科长了。可是阿拉海尔本人，因为心脏有点不好，却已经退休领取养老金了。以前他从来没和医生打过交道，现在却不得不这样做了。在晚年他尝到了住院、疗养、打各种针的滋味。然而当他刚刚觉得好一些的时候，他就在家坐不住了。他到厂里请求让他回自己的装配车间上半日班。

在他退休离厂这段期间，车间里发生了许多变化。车间主任换了个新的，装配组长也都是新的，还有许多新工人。还有一个消息使老师傅非常高兴：厂长被提升走了，新任命的厂长不是别人，正是努鲁拉耶夫·鲁胡拉。吓！昔日钳工的学徒今天飞黄腾达了！当然，一个有才能的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给阿拉海尔分配的工段并不困难。他能胜任这一工作。重新回到工厂，对他来说，比吃什么药都好。这只有那些亲身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才能理解。

月末的一天，阿拉海尔到车间办公室去办一件事。他看了看出厂产品统计表。他一看就感到非常惊奇。他一边轻轻地搔着下巴上的硬胡茬，一边说：“我有点儿不明白了，难道上个月咱们车间装配的发动机不是七百二十二台吗？”

车间主任一边低头翻着文件，一边肯定地说：“是七百二十二台呀，怎么了？”

“怎么了，统计表上写的是七百台。那二十二台哪儿去了？”

车间主任走到统计表跟前，戴上眼镜看了看，又把眼镜摘了下来。

“错了，”他吞吞吐吐地说，“是统计员给搞错了。我们一定改过来。”

一个月后，阿拉海尔发现统计表上的数字又比实际生产的数字少。他对车间主任说：“你又错了，孩子，你的办公室乱搞一通。可奇怪的是，总往一面错，总是往少里错……”

车间主任镇静地回答说：“您最好是干自己的活去吧，师傅。那些与您无关的事……”

阿拉海尔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事都与我有关。我得去找厂长谈谈统计表上的这些错误。”

“用不着白白地去跑路；错误，我们自己会改过来的。”

然而这位老师傅是很固执的。

年轻的女秘书告诉他，今天不是接待日，而且厂长正在开会，也不知道会议什么时候能结束。阿拉海尔回答说，他要等一等，于是便坐到椅子上。他等了很久很久，等得老人都打起瞌睡来了。办公室的门终于敲开了。人们从里面一涌而出。于是，老师傅又走到女秘书跟前说：“孩子，你去跟厂长说一声，就说阿拉海尔师傅找他来了。就说这么一句话，别的什么也不用说，他马上就会让你放我进去的。”

女秘书点了点头，便走进了厂长办公室。不一会儿，她回到接待室打着官腔说：“同志，厂长今天不能接见您。等接待日再来吧。接待时间这儿都写着呢。”她指了指门上贴的一张表。

阿拉海尔惘然若失地问道：“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不能接见？”

“是的，我是把他的原话传达给您的。”

此时，阿拉海尔真想不经允许就推开大门去找厂长，进去后就质问他：“唉，鲁胡拉，你还有没有良心？你敢拒不接见的是什么人啊？”但是他抑制住自己突然爆发的愤怒，扬起他那白发苍苍的头，从接待室走了出来。

这时恰好是午休。在工具车间大门口，阿拉海尔碰上了老朋友凯利姆。他在这个厂也是工作好几十年了。

凯利姆问道：“阿拉海尔，你这是急着上哪儿去啊？你在愁什么呢？咱俩坐一会儿，抽支烟吧，好久没见到你了。”

他们坐到树下的长凳上。凯利姆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亲切地端详着老朋友。

凯利姆问道：“你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当阿拉海尔讲完了自己的痛心事，凯利姆用抽完的烟头又对着了一支烟，叹了口气说道：“哎呀，亲爱的，你自己的操心事太少了，是吗？你以为发动机出产数字被改少这件事，厂长不知道吗？他知道得可清楚呢！”

阿拉海尔惊奇地盯着老朋友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凯利姆微微一笑说道：“你都白发苍苍了，可还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你给油井装配了一辈子发动机，可还不知道有些发动机是并不上统计表的。这些发动机都让人家从后门卖出去了……”

阿拉海尔坚决地说：“这不可能。”

凯利姆点点头说：“从前是没有过这种事。可是这几年……唉，还说它干什么呢！”

“既然开了口，就把话说完。你说，发动机都弄到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凯利姆对开始了这样一次谈话感到有些后悔。“现在有许多人都在盖别墅，为了给自己家里的水井买上一台发动机，他们是舍得花钱的。懂吗？”

阿拉海尔慢吞吞地问道：“你是说，鲁胡拉也知道这件事？”

“你的鲁胡拉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只是假装不知道。这样做对他更方便一些。唉，阿拉海尔，你有多傻啊！”

凯利姆又把一个烟头扔进水桶里，继续说道：“你知道咱们厂长在纳尔达兰有什么样的别墅吗？那是一栋用白方石块盖的高大的二层楼房。楼房四周是高高的石头围墙。院子里有葡萄园、花园、养鱼池……是个真正的地主庄园……”

“你怎么知道的？人们胡扯的事多着呢！”

“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亲眼看见了。是我给他别墅里的水井安装的发动机……”

阿拉海尔气愤地站起来问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吭声？”

凯利姆把脸往旁边一扭说道：“我怎么，我算是哪份儿？……”

此刻，老阿拉海尔坐在凉台上，回忆着这次谈话。他突然明白了，在他没有采取坚决行动之前，是安静不下来的。他在电话簿里找到了努鲁拉耶夫·鲁胡拉家的电话号码，给鲁胡拉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小孩，是鲁胡拉的儿子。阿拉海尔问他爸爸在家不在家，孩子说：

“我爸爸在睡午觉，过一个小时才能醒来。您是谁？”

老师傅阿拉海尔没有回答，便放下听筒。他站在那儿沉思了片刻，随后在电话簿里找到了鲁胡拉的住址，匆忙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

以前，鲁胡拉住在一个小胡同的一所旧房子里，紧挨着巴库最先盖起来的新建筑物之一、人们叫做“别什姆艾尔特波”的五层大楼。阿拉海尔曾经到过那里一两次，在他徒弟家做过客。现在，鲁胡拉却早就搬到市中心的一座高质量的新房去住了。

阿拉海尔下了无轨电车，找到了这所房子，慢慢地上了三楼。他在这儿停住了脚步，靠在栏杆上，喘着气。他的决心突然消失了，心痛使他紧锁双眉。他想：“我不应该到这儿来。我跟他说什么呢？难道他能听我的训斥吗？……最好还是回家吧……不！”他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又想：“我要是不跟鲁胡拉面对面地把我的心里话都说出来，那我就分文不值……”

于是，他使劲地按了电铃。

开门的是一个挺胖的年轻女人。阿拉海尔想起来了，在十年前，或许是十多年前，有一天，新婚夫妇请他去做客的时候，曾和她见过一面。他没想起这个女人的名字，但是她那张好看的面孔，他还是熟悉的。

她也认出了阿拉海尔。她惊奇地仔细看了看，微微一笑，说道：“欢迎您，阿拉海尔师傅，您一点都没有变。请进吧……”

老人对给予他的欢迎作了回答，却依旧站在门口问，鲁胡拉是不是在家。

女人回答说：“在家。”

阿拉海尔在穿堂把外套挂好，然后女主人把他让进了客厅。鲁胡拉是个三十六岁左右的瘦高个儿。他扔下手里的报纸，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朝前迈了一步来迎接客人。

阿拉海尔握住厂长递过来的手说：“对不起，厂长同志，我打扰你休息了。”

厂长仔细地看了老头一眼，好象心里在琢磨：“这个不速之客来干什么呢？”他说：“没什么，没什么，请坐吧，阿拉海尔师傅。”

师傅坐到安乐椅上，把这个宽敞而明亮的房间环视了一下。他还从来没见过这样华丽的家具和那么多精致的玻璃器皿。这些器皿都装在一个漂亮的小橱里。这个家，正象俗话说的那样，真是要啥有啥。

鲁胡拉的妻子把一张刷刷作响的白桌布铺在圆桌上。

阿拉海尔对她说：“您什么也不要弄，不需要。”

她微微一笑说：“我也没准备弄什么，咱们只喝点茶。”

“谢谢了，什么也不要。我的话很短，是公事。”

鲁胡拉使了一个眼色，他的妻子便立刻走出了房间。

鲁胡拉说：“您说吧。”

老师傅小声说了起来：“厂长同志，你不要以为我是来求你什么的。我是想讲一下我们车间里发生的事情。我今天就是为这件事到你的接待室去过。可当时你很忙，没接待我。而这又是件急事。”

厂长坐在阿拉海尔对面的安乐椅上，稍稍眯缝着双眼，目不转睛地看着阿拉海尔。他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然后说道：

“女秘书向我报告说您来了。可是，师傅，您不要见怪。尽管我忙，我本来是可以接待您的。但是，事情是这样的，我定了个严格的制度，只在一定的日期一定的钟点接待。这个制度就是最亲近的人也得遵守。制度就是制度嘛。”

阿拉海尔点头说：“我同意。制度是个好东西，应该遵守。但是，你听听装配车间发生的事情吧……”

于是，他就把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和统计表上的数字之间的差别情况讲了一遍。鲁胡拉没有打断他的话，一直听他说完。等老人住了声，厂长点着一支香烟，说道：“我想这只不过是一个错误。无论如何，我一定把它搞清楚。师傅，您的话说完了吗？”

阿拉海尔掏出手帕，擦去额角上的汗，说：“你去搞清楚吧，你一定要搞清楚。那些盗窃犯应当送交法庭审判。从后门卖出去的那些发动机应该一个不少地都从拥有别墅的人手里追回来。”

鲁胡拉皱起眉头说：“从哪些拥有别墅的人手里弄回来？”

“从那些给自己别墅的水井买发动机的人手里追回来！”

“这我一点也不知道。”

使人感到压抑的沉默开始了。阿拉海尔突然感到自己心中充满了愤怒。这算是什么呢？什么时候才能把事情的全部真相一下子都说出来，而不是象现在这样半吞半吐地说呢？……

“努鲁拉耶夫，听说你在纳尔达兰也有一所别墅，不只是一所别墅，而是整整一个地主庄园……有养鱼池……还有一口装着发动机的水井，是真的吗？”

厂长猛地从安乐椅上站了起来。

“阿拉海尔师傅，您太放肆了。”

老人家也站了起来。他凝视着自己这个过去的徒弟，问道：

“鲁胡拉，你的工资是多少？”

(下转 98 页)

驳苏修的所谓“地理发现”

——关于黄河源的发现问题

石 隶 实

黄河，她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人民的骄傲。黄河源远流长，从巍巍的巴颜喀拉山北麓，一泻千里，滔滔不绝地奔向浩瀚的大海。辽阔而肥沃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但有那么一个国家的一伙人，竟将黄河同他们“祖国的荣誉”扯在一起。这是何等的荒唐可笑啊！前年，苏修《自然》和《星火》两家杂志刊登了两篇奇文^①，就胡诌什么黄河源地区是他们祖先——老沙皇的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的，时间是一八八四年。据说，自这一“重大地理发现”之后，从帕米尔到黄河源地区，在地图上“便不再是空白点了”。中国人应该谢谢那个“斯基”，幸亏他的“发现”，才对黄河发源地有所了解。

然而，不幸得很，普尔热瓦尔斯基的“发现”，不过是早已被中国人民认识了的东西，根本谈不上什么新发现。至于说最早发现黄河源的，不是与黄河之水休戚相关的中国人，而是十九世纪末的一个俄国人，那更是弥天大谎。

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是用斧头也砍不掉的。从遥远的古代起，劳动、生息、繁殖在大河上下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开始了认识、改造和保卫黄河的历程。黄河古称“河”。殷商甲骨文已有“河”的记载。最早注意到黄河源的是在战国时期。《禹贡》中有“导河积石”的说法，指出黄河是从积石山方向流来的。《山海经·西山经》则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认为积石山以西的高大的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这些记载，反映了战国以前人们对河源的认识。

随着秦汉多民族的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在探索黄河源问题上又前进了一步。汉武帝时，“汉使穷河源”^②，表明当时我国人民已十分重视河源问题，并进行了对河源的考察，这比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所谓“考察”早了近两千年。在汉代，人们已经知道，黄河发源于羌族（今天藏族的祖先）居住的地方，上游是西南东北流向^③，从积石山北黄河弯曲处到

① 《路途来鸿》和《为了祖国的荣誉》。

② 《汉书·张骞传》。

③ 《汉书·地理志》金城郡河关县下载：“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

河源有千里之遥^①，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

公元六〇九年(隋大业五年)，在今青海境内设置“西海”、“河源”等郡，河源地区成了隋王朝统辖的一部分。到了唐代，对河源的认识有了个飞跃。公元六三五年(贞观九年)，唐朝将领李靖、侯君集等兵分两路，进击吐谷浑，深入青海腹地，“览观河源”^②，作了实地观察。不久，青藏高原上的吐蕃和唐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大量地吸收汉族的先进文明。彼此间往来频繁，河源地区成了汉藏兄弟民族友好往来的交通要道，因此，河源问题也就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写了有关河源地区的专门地理著作《吐蕃黄河录》，可惜这部书没有流传下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唐代有关河源的详细记载，是公元八二二年(长庆二年)刘元鼎出使吐蕃带回来的知识，见于新、旧《唐书·吐蕃传》。据记载，黄河发源于“紫山”，吐蕃称为“闷摩黎山”，这一名称明代译为“抹必力山”，即今天的巴颜喀拉山^③。至此，“河出昆仑”的模糊概念，已经被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实际知识所代替了。

面对铁一般的历史事实，苏修老爷们却来一个不承认主义。散布河源地区从来“无人迹”、“世代不为人所知”等等谎言，不仅暴露了他们的无知，而且说明了他们狂妄到了顶点。原来，在他们眼里，汉唐时期那些考察统统不算数，只有普尔热瓦爾斯基才是“第一个勘察者”，在地理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尽管唐代还没有从地理学的角度上作专门性质的科学勘察，以确定黄河正源的地理位置，但对河源地区已有清楚了解，这是谁都否定不了的。就是论第一次正式地理勘察和研究，那也决不是在十九世纪末，由一个俄国人进行的，而是早在十三世纪，中国人就开始进行了。请继续看历史事实吧！

公元一二八〇年(至元十七年)，元朝政府派一位名叫都实的，“往求河源”。都实一行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出发，历时四月，到达“河源”，对整个地区的地貌、气候、动植物资源等都作了详细的考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对河源的实地考察，其成果见之于《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等书。经过这次调查和西藏地区一些地图资料的内传，对河源的认识达到相当准确的程度。例如已经知道，河源地区有个星宿海，“方可七八十里”，往上还有一条百余里长的河流，是黄河的正源，源头“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④。这种认识，与今天黄河正源约古宗列渠上源一带有不少大小不一的水塘的情况完全一致。可见，元朝在河源认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比普尔热瓦爾斯基的所谓“新时代”，要早

①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河即析支河，是指积石山北黄河弯曲处的一段。

② 《新唐书·吐谷浑传》、《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九年等。

③ 《钦定河源纪略》卷一八。岑仲勉《黄河变迁史》谓闷摩黎山“依音音转变之理，可能即‘抹必力’的异译。”

④ 见《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该附录是综合潘昂霄和朱思本二人的记载所写成的。潘昂霄著有《河源志》，系公元一三一五年根据都实之弟阔闾出所述的记录。朱思本(公元一二七三——一三三三年)所根据的是八里吉思家藏梵文图书。

六百多年。

十八世纪初，清朝政府又一次对河源作实地勘探。公元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侍卫拉锡、舒兰等一行到星宿海，登高察看“星宿海之源”及周围群山，回来后较详细地叙述了黄河三个源头的流委^①。以后，清朝政府又多次派遣考察队，“往穷河源，测量地度，绘入舆图，凡河源左右，一山一水，与黄河之形势曲折，道里远近，靡不悉载，较之元人所志又加详焉。”^②康熙末年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其中河源部分所根据的就是这些测量资料，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把黄河源画得比较正确的地图。此后，齐召南于公元一七六一年（乾隆二十六年）写成的《水道提纲》一书，对河源地区山山水水记载详尽，并标出源头的经纬度，与今天的情况基本吻合^③。

请问苏修老爷们，你们胡说十九世纪末黄河源地区在地图上还是“空白点”，这有什么根据呢？除了说明你们对中国历史地理知识等于零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如果自己无知，还是老实点好，为何把“第一个勘察”的桂冠加到老沙皇军官的头上，并大肆吹捧所谓“地理发现”呢？拆穿了，那是别有用心的。稍为懂得近代世界史的人都会知道，所谓“地理发现”，本来就是殖民主义强盗的事业。强盗闯进别人的家园，不仅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而且指指点点，宣称大片河山是他们“发现”的，蛮横地宣布属于他们所有。老沙皇在黄河源地区的“勘察”不正是这样干的吗？看，当普尔热瓦夫斯基“考察”了黄河上游札陵、鄂陵两大湖泊后，就曾“根据第一个勘察者的权利，把其中一个称之为‘俄罗斯人湖’，另一个称之为‘探险队湖’”。如今，苏修老爷们重温此番情景，恰好暴露了新沙皇扩张主义的狼子野心。

好一个“第一个勘察者的权利”！札陵、鄂陵两大湖泊根本不是那个“斯基”发现的，早在此人来到前一千二百多年，即唐贞观九年，名将李靖、侯君集等就曾“达于柏海”^④。据考证，“柏海”就是今天的札陵、鄂陵两湖。这是有关黄河上源二个湖泊的第一次可靠记录。至于“札陵”、“鄂陵”的正式名称，最晚在《大清一统志》引用阎若璩（公元一六三六——一七〇四年）的《书经地理今释》中已见记载，阎所据的资料至晚在明末清初。稍后，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对两个湖泊的大小、形状、水色都有生动的描述，与今天的情况完全相同，显然是实地考察的结果。普尔热瓦夫斯基妄狂地自封是“第一个勘察者”，无非是吹牛而已。如果按照他那样的“权利”办事，那末，任何一个外国人跑到伏尔加河源头游览一番后，岂不是都有权利自称为伏尔加河源的发现者吗？显然，那种“权利”，只能是强盗的“权利”，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权利”。

苏修老爷们为了论证所谓“第一个勘察者的权利”，还污蔑我国人民在河源认识史上一直保持着“伏流重源”说。这又是对历史的蓄意歪曲。诚然，我国古代曾经出现过“伏流

① 《康熙东华录》卷一五。

② 《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五四六青海厄鲁特山川黄河条。

③ 《水道提纲》卷五。

④ 《册府元龟》卷九八五。

重源”的说法，认为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东水注盐泽（今罗布泊），然后潜入地下，往南流出为黄河。但是，这种因受历史条件限制而得出不确切的说法，到了东汉末年就被人否定了^①。唐代，经过贞观、长庆年间几次派员亲历河源地区，河源问题已大体清楚，“伏流重源”说不仅实际上被推翻，而且还有人针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驳难和辩述，杜佑就是突出的一个^②。宋代，人们明确指出河水源于西域的说法，“皆失其实”^③。自元至清，对河源多次实地勘探的结果，更有力地否定了“伏流重源”说。这是河源认识史上的主流。至于东汉以后，历代一些迂腐儒生，把“伏流重源”说奉为信条，死抱住不放，那只是河源认识史上的一个邪派，根本不能代表人们的认识水平。谁都知道，世界上今天还有人虔诚地相信上帝创造人，这难道可以代表人类起源问题上的科学认识水平吗？苏修老爷们用早已被否定了的“伏流重源”说来贬低我国古代认识河源的水平，徒然暴露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敌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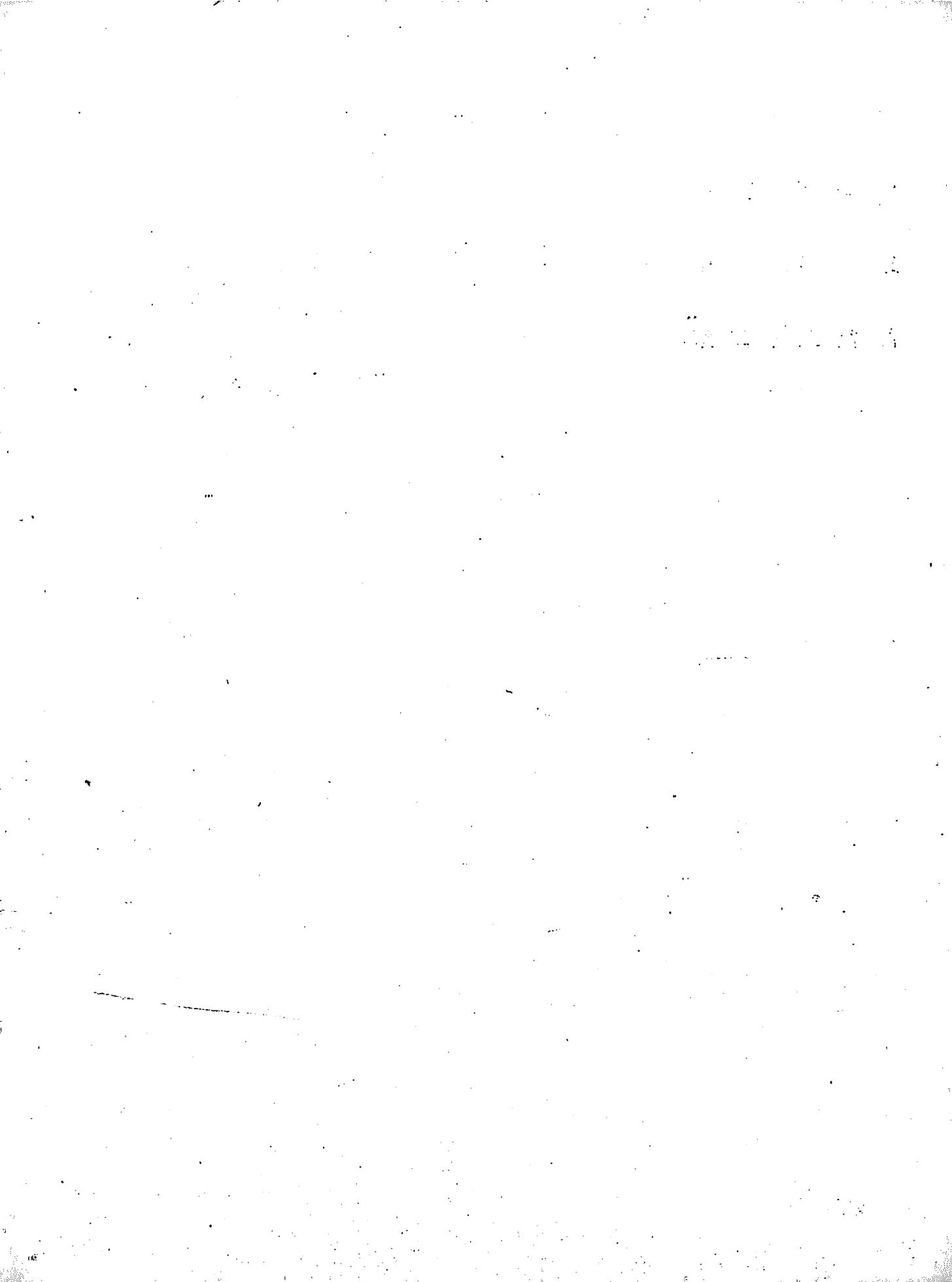
现在十分清楚，苏修老爷们从老沙皇陈旧的档案堆里，捡出一个普尔热瓦尔斯基的亡灵，编造一套“发现”黄河源的神话，究竟是想干什么的了。他们不是疯狂地叫嚷要“使当年的气氛重现在我们的眼前”吗？注意！“当年”即十九世纪末，“气氛”正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国是它们争夺的最后一块大肥肉。各个殖民强盗怀着觊觎我国领土的野心，纷纷派遣“探险队”到我国边疆地区和内地进行所谓“探险”活动，为瓜分中国制造根据。沙俄就是最积极的国家，而普尔热瓦尔斯基则是老沙皇派到我国来的最大的殖民主义“探险家”。他打着“科学”考察的幌子，“积极执行皇上意志”，为沙俄侵略扩张政策效劳，“简直是卖力得不得了”。沙俄参谋总长直接参与了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活动，为他抽调武装人员，配备武器、弹药和仪器，沙俄驻华使馆也同他密切配合。因此，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所谓“探险”活动，实际上是老沙皇侵华罪行的组成部分。他曾经毫不掩饰地宣布要在中国“重复”柯尔蒂斯征服拉丁美洲的事业，要“开发”他所勘察过的地区，不仅把河源地区的札陵湖、鄂陵湖命名为“俄罗斯人湖”和“探险队湖”，而且狂妄地把中国的汗腾格里峰命名为“解放者沙皇峰”，活现了这个沙俄侵华急先锋的强盗行径。九十多年过去了，苏修公然还在颂扬普尔热瓦尔斯基“立下丰功伟绩”，这就证明今天的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他们决不会放弃侵略“权利”，亡华之心不死，日夜梦想着“重现”当年老沙皇侵略中国的“气氛”。

但是，时代不同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帝国主义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新沙皇如果真要和老沙皇的“探险队的命运共担忧，同欢乐”，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和老沙皇同样的命运。

① 见《汉书·张骞传》师古注引。

② 见《通典》卷一七四。

③ 《舆地广记》卷一六。



◆
一 九 七 六 年

◆
第 四 期

◆
总 第 三 十 二 期
◆

XUE XI YU PI PAN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编辑部编
(上海复旦大学)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国外发行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399信箱)

代号: 4-193

定价: 0.25元